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9月30日第19期 总第19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7期

【专稿】

唐 燕 从文革初两封给毛主席的信想到的

【评杨钱书】

胡鹏池 三个软硬伤——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

胡鹏池 一条线，还是两条线？——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上）；

兼评钱理群《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第一章

小 鹰 对谈钱理群先生的“文革观”

【读书】

崔龙浩 中国革命暴力现象的再审视

——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怀人】

秦 学 忆母亲——为文革五十周年而作

【序跋】

黄玉梅 追寻与命运——造反派自述自序

【旧文新编】

郜银林 小学生成了“反革命”——双堡小学“教育革命”中的反标

【资料】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人民日报 1966.06.18）

【本刊声明】

【专稿】

从文革初两封给毛主席的信想到的

唐燕

—

1966年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满怀革命的激情”，为了“表示我们彻底闹革命，彻底砸烂一切旧教育制度的决心”，相继给毛主席各写了一封信（摘要）：

“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的确确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继往开来的极其关键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把我们推向世界革命的舞台，把北京推向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成为当代世界革命的伟大旗手，我国人民成为世界革命的主力军，我们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据地。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要我们保；老一辈们坚决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要我们继承；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重担要我们承担，伟大正确战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要我们接过来、传下去！我们这一代真是关键关键的一代！”

“我们认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的。”“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实际上是在扩大并延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

“这种升学制度，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

“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二、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我们想：十七、十八岁的青年，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应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应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我们绝不同意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工农兵中去，因为那时一个人的世界观基本形成，再改造就困难了；而且有些人有了“知识”，就认为有了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三、假如今年一定要有一批人去升学，就请党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挑选。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坚决奔向那里，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我们有革命的自觉性。旧的考试制度只能束缚我们的革命要求，砸烂它，我们会更自觉地为革命学习！”

五天后，6月11日，北京四中高三五班部分学生写信响应：

“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极广，影响甚大。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剥削阶级愚昧人民，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成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进行修正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

它，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

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罪恶制度再毒害新中国的青年一天，我们要坚决打倒它。”

“我们建议：

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

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

四、加速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

五、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

“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我们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

二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两封信，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6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此外，当天的《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今天，本报发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没有发表的大量群众来信，提出了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强烈要求，……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呼声。”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个决定，是彻底搞好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的重要措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选拔录取。高级中学的招生考试也采取这种办法进行。”

“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钻到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怀着刻骨仇恨，对广大工农兵的文化翻身深恶痛绝。他们利用所盘踞的教育阵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教育路线。如果不搞掉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贯彻不了的。”

“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

1966年6月19日，“四中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召开大会，会上高三五班学生代表发了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并在当晚新闻中播放了庆祝会实况。”

6月20日，这两个班的代表到当时中国唯一的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发表了演讲。播出时他们发现，原稿大部分按“上面布置的统一口径”被删改了。

三

这两封信及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告诉并启示我们：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废除旧的考试升学制度、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全面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实现红五类优先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将是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

文革初突然废除高考中考制度只是“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在校领导一夜之间统

统靠边站，工作组刚刚进校时的文革初期就为两年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后来不通过考试而是经推荐选拔招生工农兵学员等等的教育革命举措奠定了基础；

1968年底起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着鲜明的政治缘由，而不是有些文革研究者认为的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所迫。上山下乡运动源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新中国培养的学生被修正主义的教育毒害了17年必须到工农兵中去锻炼改造；以及缩小三大差别等政治理念。

著名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先生通过仔细的数据考证，发现就在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相同数量的农民被招进城市工作。他认为，毛的缩小三大差别，接受再教育、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传之词，确有培养可靠的接班人的考虑，也有预防和惩治的意思。

他说“那时很多的非洲国家也想向中国学习，像赞比亚，他们也试过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但一个月以后就全都跑回来了。”

潘先生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必须有一个政治的机制才可以做到。”“毛泽东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经济挂帅，而是政治挂帅。”（《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9日）

笔者以为此言极是。当年若没有民主法制被极度破坏的高度集权锁国的文革大势、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若没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迫切愿望等等的政治背景，文革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有把是否上山下乡提到了对毛忠不忠高度的上山下乡运动。

应该承认，文革前实施的尚未形成运动形式的上山下乡举措尽管越来越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政治含义，但那时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由于单一呆板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全部消化逐年大量增加的中学毕业生，由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以及大跃进等失误使当时的升学和就业形势陷入了越来越窘迫的困境。

可是到了1968年下半年，刘邓已被打倒，红卫兵不再有利用价值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既然早在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作出了包括废除考试制度的，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

命“的决定，那么到了1968年底，就无需再经过任何程序，仅凭“接受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就有了随后十年的一千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事实上，尽管由于当时“停课闹革命”已长达两年多，大学已积累了三届、高中初中积累了六届，全国城镇一共滞留了四百多万毕业生，无疑具有急需给他们出路的现实紧迫性，但是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初中央就已有的战略部署，不具偶然性、突发性和未预见性。

四

为什么是这两所高干子弟扎堆的北京名校里的，原本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写了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信呢？

四十多年后，原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孔丹说：“四中废除高考这件事情，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来激烈的过程开始之前，或者说是还比较有序的情况下出现的。之所以发生在高三五班，与我们班有些学生的家庭背景特殊有很大关系。”

“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背景，有上面打招呼。实际上就我们的本性来讲，我当时还记得我自己内心有的一个独白，就是对我们这批四中的学生来讲，废除高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不能以考试方式来显示我们自己的能力了。”

“我作为当时一个党员，正好到19、20岁，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强的按照中央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来面对任何事情的愿望，这个事情要顺应当时工农兵的想法，和群众的潮流，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事。”（孔丹答记者问）

“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五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还有心灵深处的一种遗憾。”¹

可见：当年他们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实乃上面授意；对此孔丹们并非情愿；“不过得了风气之先”。

¹ 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页48-49，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

五

对草根民众来说，文革风暴是突如其来的，废除我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考试制度更是猝不及防的。可是为什么孔丹说“这个事情要顺应当时工农兵的想法，和群众的潮流”呢？

这两封信里并没具体说废除高考怎么是“工农兵的想法和群众的潮流”，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废除高考制度是“广大群众的呼声”，为什么6月18日以及其后几天的《人民日报》连一封社论中提及的“大量群众来信”都没发表。

今天，经历过文革的我们终于看清楚了什么是“群众潮流”。群众如水，载舟覆舟。引导得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引导得不好，没有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的群众则会成为盲目跟风的乌合之众甚至洪水猛兽。

激进、反智、情绪化、功利化、非组织化和非程序化是乌合之众的特点，乌合之众的心理意识同质均一，往往大哄大嗡，有破无立；遇事只简单选择两个极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时而执拗偏狭，时而随波逐流；毫无理智、包容、妥协可言，极易被运动。

一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们却把群众极端理想化，片面推崇平民价值观，认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强调对群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他们宣扬抽象的、整体的“群众”，蔑视组成群众的具体有人性的个人，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否定精英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蛊惑、操控、强奸民意、煽动仇恨情绪则是野心家们惯用的伎俩。

文革中的破四旧、大串联、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全民敬祝、红海洋、中南海围墙外的揪刘火线、火烧英国代办处、上山下乡运动等等无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这两封给毛的信、孔丹之谈、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按上面布置的统一口径”播放学生代表讲话，无可辩驳地表明：早在文革之初，思想单纯的高干子弟中学生就已经开始被利用了。

六

高层的政治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分歧，草民不可知也不能知，高干子弟却可或多或少知道些内部消息，以至往往“得风气之先”。

他们得风气之先不自写这两封信始。

文革前，一方面，当大跃进失败后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决定发动文革把失去的权利夺回来却遭到顽强抵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时，他需要先有一支义和团式的造反队伍打乱既有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苏论战、反修防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的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提出及其应具备的条件；全国农村城市大搞四清、五反运动（从1963年开始在四中、八中等少数几个北京中学的学生中也搞了四清）；不断升温的突出政治和学毛著等等一系列运动和动向，无不影响、左右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干子弟们的思想和言行，即使他们对某些现象如孔丹那样内心有独白，心灵深处有遗憾，也“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因此，尽管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秘密成立时有不少具体的自发性因素，但实质上他们是得了风气之先的。

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纪要中毛主席明确表达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并鼓动学生造反。为了把“自己的子弟”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一些学校给干部子弟单独开会，向他们传达1964年和1965年毛主席与毛远新以及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要点：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回去带头造反。”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

1966年3月毛在杭州会议上说：

“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

“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

“这批人实际就是国民党。”

“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1966年5月7日毛指示要把全国办成军队式的大学校，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并明确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6月1日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领导宋硕、彭佩云和陆平，《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直言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还第一次发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有了如此明确的引导，长期受暴力革命思想熏陶的无知无畏的中学生们自然认定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统治着我们的学校。文革一来，他们心中的潘多拉盒子便一下子被打开了，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下，不仅在校内残酷打骂校长和老师，还到社会上肆意批斗各类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对海淀区中学生代表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

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打人了。”此后，“好人打坏人活该”便被不暗世事的中学生们广为传播，成了打人者的护身符。

8月8日，就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打死的第三天，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肯定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并指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代表说“要武嘛”，林彪则代表毛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再次号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并又一次要红卫兵破四旧：“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紧接着，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以“破四旧”的名义打砸抢杀烧、抄家、破坏文物、摧毁文化典籍、揪斗地富反坏右、勒令民主党派解散、把城里的“牛鬼蛇神”驱逐到农村，……在校内他们更是武斗升级，北京女三中的沙坪校长就是在8月19日被残酷殴打至深夜，8月20日咽气的。

对这样的红色恐怖《人民日报》却进行了连篇累牍的称赞性报道，并发表社论《好得很》：“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当这些行为理所当然引起各地基层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甚至有的与红卫兵发生了冲突时，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七

毛说过：“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我国以农民运动起始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点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我们党某种程度上是个农民党。因此，无论是高干子弟还是他们的父辈，其身上的小农意识、封妻荫子、打江山坐江山、世袭、特权等等封建思想糟粕时时处处毒害腐蚀着他们。

红卫兵一代是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文革前随着阶级斗争、阶级路线、仇恨教育越来越扩大化、绝对化，全社会从上到下权力等级、人际关系、社会机遇、利益分配等等无不以出身定位，已然唯成分论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固有的特权意识和舍我其谁的革命气概使干部子弟对血统论一往情深，把接班人资格看作是自己的天赋权力。

使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文革一开始自己竟成了文革舞台上的先锋和主角，他们便更加不知天高地厚，自视血统高贵，唯我独红、唯我独革，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甚至把斗争矛头对准黑五类子女。结果北京中学的第一批红卫兵成了由红五类子女组成的、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特权组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他们的旗帜和锋芒，很快陷入了封建血统论的泥潭不能自拔。

更使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不久他们的父辈也受到了文革冲击，“好汉”瞬间成了“混蛋”“狗崽子”，血统优越感一下子荡然无存，他们对中央文革的不满便顺理成章了。

我们从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称上和“联动”《通告》（003文件）中公布的组织路线上，就可看出高干子弟在文革初期赤裸裸的封建血统论和世袭等级观念：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属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尽管如此，正是“联动”第一个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帜，第一个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

虽然血统论受到了中央文革的批评，“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老红卫兵们仅在文革舞台上活跃了半年就被以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取代而销声匿迹了，可是当时中央文革反对血统论为的只是更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批刘邓，是利用平民造反派与不肯交出权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

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激活了血缘文化基因，导致了血统论的泛滥。文革时，高层权力高度家长化、家族化和血统化，两个最高夫人轻而易举拥有至高权力，侄子侄女成了最高领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全国从上到下，血统决定着每个人的地位、权益、身份和命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所有亲属统统备受诛连；……在表明中国社会仍具有马克思指出过的中世纪“政治生物性”特征。

今天，有人声称文革本身是好的，“红八月”只不过是高干子女搞偏了。这种企图用切割法为高层脱罪，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当时的未成年人身上，拒绝明确该承担者应承担的责任，并且不予以追究，显然是欲盖弥彰。

当然，老红卫兵应为自己在文革初期残酷批斗校长老师和“红八月”的违法行为反思、忏悔、道歉、付出代价，但毕竟他们只是帮凶，只是奉旨造反。

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高干子弟有的掌管着国家要害部门，有的投身商海，又一次次领了风气之先，得了风气之先。从改革之初利用双轨制倒卖批文，到后来的圈地、盘楼，直至今天把全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了自己手里，形成了吉拉斯称之为的“新阶级”。

这些“贪婪而不满足的”“新阶级”越来越意识到，正是现行体制使他们具有了执政

合法性，正是血统论给了他们巨额的既得利益。这个专制体制似乎并没有联动时期他们倒霉时以为得那么坏，对一直大行其道的血统论他们更是受用得有增无减。

文革初，他们在红司令领导下把矛头指向教育、文化，指向校长、老师，这与毛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由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队伍中固有的对文化、对文明的恐惧感、敌视感和对知识分子的排斥感有着某种精神暗合。

如今，“新阶级”又被权钱蒙住了双眼，对吸收当代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没有应有的关注和渴求。他们视而不见：

一、血统论的兴衰反映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而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尚未走出家国的认知，亲缘政治仍不得不是我们观察社会腐败的重要视角。血缘决定权力和财富的代际传承是前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我们早就应设法加速从血缘文化向民主契约文化的社会转型了。

二、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甚至在 GDP 已位列第二的今日中国，首要任务不是“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摒弃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封建思想糟粕。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是社会转型中我们必须把握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当今，虽然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远远未达到完美，但由于它固有的纠错机制，与马克思时代的那个原始资本主义已经大不一样。资本主义引领的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对近现代历史发展发生了极其深刻广泛的影响，互联网、智能手机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现代资本主义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逐步融入文明世界应成为我们的目标。今日中国最该防范的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原始资本主义。

宏观上，“新阶级”只是物质地、暂时地得了风气之先，如果他们不努力从与人民大众的对立和冲突中走出来，必将遭到历史的淘汰和耻笑。■

【评杨钱书】

三个软硬伤

——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

胡鹏池

一、对史实的阉割

杨书《天地翻覆》第五章说：刘、邓最主要的常规手段就是向各单位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多次采用的办法。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进人民日报，派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进北京大学。

这段话见于《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88-589页。然而，第589页紧接着还有一段话：“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

这段话与上段话紧挨着、字数也不多，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了。

先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段话的意义。

1. 可以从中看出“派工作组”的做法是经过了毛批示“同意这样做”的中央决定，刘、周、邓履行了所有必要的组织手续。

2. 可以从中看出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的，担任组长的是担任毛秘书长达20多年的陈伯达，总不能将陈伯达说成是刘邓的人。所以所谓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是“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3. 还可以看出：陈伯达工作组刚一进驻《人民日报社》就立刻改组了报社领导班子，原来班子靠边站。所以工作组一旦进驻某单位就将原来班子“一锅端”，即“一派二罢”

的做法不仅仅是过去运动中的普遍做法，即使对于刚开张几天的文革也是有先例可循的。而毛对陈伯达工作组的做法无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4. 5月29日刘、周、邓会议之所以同时决定向北大派工作组，是因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已于5月25日中午贴出，北大开始陷入混乱。既然毛批示“同意这样做”，那么张承先工作组进入北大当然可以认为是毛派的，至少也可以认为是毛同意派的。江青7月25日在北大讲话“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的谎言不攻自破。

5. 又据查，张承先工作组进驻北大是6月3日，而中央广播台广播大字报是在6月1日晚上。那天白天，毛泽东在阅康生报送的这张大字报上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由此可见，毛已经预见到这张大字报广播后的巨大威力，如果此时的毛不想给北大派工作组，那是完全来得及通知的。

我们从杨书前几章已经看得很清楚，作者总想将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说成是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对抗。这只是作者的主观臆断与写作意图，虽然任何一个写作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避免有一些倾向性的认识和判断，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允许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一旦发现真实史料与预想之间存在着重要矛盾，则一定要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来修正自己的预判或意图。

在已经发现真实史料与自己写作意图有矛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去忍痛割爱，果断修正自己的写作意图，而是故意将真实史料阉割、隐瞒、说一半留一半，搞得支离破碎，这不仅仅是史观问题，更是史德问题。

当然问题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如果作者认为是无意间的“错漏”，那就应该果断地改过来。当然这样的改正的确也很困难，有关章节需要推倒重写。但是再困难也必须要改正，否则谬误会越陷越深，越来越大，危及全书。

二、对史实的误记

作者接着回忆了从“四清”回校后见到的情景：

6月17日，我们从延庆县“四清”工作队回校。一进校门，就好像进入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一些揭发高级干部特权的大字报，使我对老革命家们多年的敬仰减除了大半，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啊！虽然那时的腐败和新世纪初的腐败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大家都很贫穷的时候，那样的腐败和特权也让人难以接受。

大字报的另一个内容是“蒋校长姓‘马’还是姓‘修’”的争论。蒋校长是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一广播，“火”已经烧到清华来了。

作者多次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文革史，我认为这是可取之处，体现了亲历者“局中人”的优势，给人以真实感、现场感。问题是，作者的回忆必须真实可靠，否则还不如不联系。而作者的该段回忆却与史实明显不相符。

清华参加“四清”的学生有大四、大五、大六三个年级的3000多人（含一些老师、干部在内），回校日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本人从怀柔回校的时间是六月初，却不记得具体哪一天。作者清楚记得他回校日期是6月17日殊为难得，但是在此前后的一星期左右，哪有什么“大字报的另一个内容是“蒋校长姓‘马’还是姓‘修’”的争论”？

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个多星期前大字报的陈迹残片。因为工作组已经在6月9日进校了，蒋南翔与清华校党委瞬间已经成为“黑帮”。

那么，6月17日前后的清华园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这时的清华文革正处于短暂的“斗黑帮”时期，校园内的主要场景是一部分学生已经对各式各样的黑帮、保皇派进行零星的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等。有的系甚至还游斗了一些学生干部与辅导员。刚进校不久的工作组还没有有效地控制全校秩序，但总体上讲工作组从一开始起就不赞成这样无组织的乱斗乱批，有的工作组员批评这些同学不讲政策；有的还将戴在“黑帮分子”的帽子摘下来，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

不能这样做。”6月12日晚，部分师生在西大操场狠斗黑帮，工作组不仅不支持，还发表广播讲话叫同学们回去睡觉。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与一部分热衷于“揪黑帮”的学生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工作组成员出来维持秩序批评学生，部分学生就认为工作组是对运动设置清规戒律，客观上是为“黑帮”解围。于是少数同学就开始贴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13日，力904班学生王铁成贴出大字报“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

6月14日，力05班学生刘泉等贴出大字报“现工作组不可信任”；

6月16日，化901班学生刘才堂贴出大字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

同日，化902班学生蒯大富、孟家驹贴出“工作组往哪里去？”。

所以，老杨所说的6月17日回到清华后看到的“另一个内容”是不存在的，校园的新热点已经是围绕工作组的大字报。

作者的叙述不是日期记忆失误，就是对大字报内容的记忆失误了。

三、哪来的逻辑？

杨书说：“为什么这些刘少奇、贺龙等毛泽东将要打倒的高级干部，急急忙忙地打倒蒋南翔？文革初期有一个词，叫“抛出”。高校党委“抛出”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手握实权的高级领导就“抛出”高校党委书记。大概这是刘少奇等对抗毛泽东、实现自保的策略之一。”

高校党委“抛出”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的做法，这是一贯传统。延安时期也是以拿王实味、丁玲这样的知名知识分子开刀的；解放初期拿俞平伯、胡风开刀，反右拿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开刀，文革拿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开刀。自从毛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以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各级党委的日常工作，高校党委在文革初期“抛出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既是党的工作，党的任务，也是为了转移目标，实现自保。

而手握实权的高级领导之所以抛出高校党委书记，则是打倒“彭罗陆杨”之后的必然。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都已经被打倒了，打倒几个彭真和北京市委领导下的“高校党委书记”正是紧跟毛泽东之首选。这既是党的任务，也是转移目标，实现自保。

奇怪的是最后一句话“大概这是刘少奇等对抗毛泽东、实现自保的策略之一。”将“对抗毛泽东”与“实现自保”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关系都逻辑不通。既然刘少奇要“自保”，当然要“紧跟”和“高举”。“紧跟和高举”才是“实现自保”的唯一办法，怎么可能用“对抗毛泽东”来实现呢？

其实这主要不是逻辑错误，而是常识错误。■

【评杨钱书】

一条线，还是两条线？

——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上）

兼评钱理群《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第一章

胡鹏池

本文目录

- 一、杨继绳：从“角斗场”到“点火灭火”的演变
- 二、胡鹏池：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
- 三、钱理群：清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 四、关于钱理群文章的讨论
 - （一）孙怒涛对钱文的高度评价及对校友的贬抑
 - （二）杨继绳对钱文的高度评价及对校友的贬抑

(三) 蒯大富同班同学王大定对钱文的评价

(四) 两位外校学者李海文与朗钧对钱文的点评

(五) 我对这些“评价”的评价

五、杨继绳、钱理群的激进造反派情结

(一) 郭建文章的启发

(二) 杨、钱也是这样的造反派学者吗？

(三) 杨“文革日记”及对钱文“完全同意”反映什么？

六、也谈对清华两派的认识

(一) 沈如槐、陈楚三的《回忆与思考》

(二) 414 仍然是左倾错误的造反派派别

(三) 414 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四) 造反派学者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七、本文以杨继绳自己的一段话暂告一段落

一、杨继绳：从“角斗场”到“点火灭火”的演变¹

杨书《天地翻覆》第五章约两万字，标题是“刘少奇的反右运动”，内分五小节。第一小节：“从清华文革谈起”。第一小节的第一段：毛泽东通过发表姚文元文章、下达《“5·16”通知》、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等多种非常手段，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采取共产党的常规手段，压制和扑灭文化革命之火。

本文就从这第一小节的第一段谈起。

作者通过这一段为初期文革构设了一条“点火灭火”的主线：毛点火，刘邓灭火。

¹ 标题简洁，有时会带来含意模糊、辞不达意。上述标题的完整表述是：“杨继绳关于初期文革的分析从‘清华是毛刘角斗场’到‘点火灭火’的演变”。专此说明。

政治运动之火与自然界的森林之火不一样，森林之火无论是自燃，或是由野炊中的余烬未灭、死灰复燃，乱扔烟头等引起，或是坏人破坏等，灭火总是正义的。政治运动中的点火与灭火，是非界限相对模糊。从后续宣传所形成的舆论，毛点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发动亿万革命群众，瞄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的是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有了完全正义的内涵；而刘邓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压制和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一开始就有了非正义的外延。

会有人认为我这样的分析是“吹毛求疵”，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回溯以往。其实老杨在早前作品中所构设的初期文革主线并不是“点火灭火”，而是“角斗”。

早在2013年，老杨为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写的序言《从清华大学看文革》的第一节标题是“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他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如果人们按“角斗场”去想像：文革初期，浑沌初开，清华园变成了一个角斗场，场中有两个角斗士，刘傻乎乎，不知自己力量的渺小，不知对方力量的强大，居然先出招；毛当然是一个有经验的角斗士（不如说成“老猎手”），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后发制人，一招制胜。

这是多么形象生动的一幅图象啊！而且按一般人的思维方法，先出招者咎由自取、自取其辱；后发制者有合理性、正义性，读者的同情与欢呼自然应该给予后出招者。

《天地翻覆》虽然没有再用“角斗场”这个意象，其实，“点火灭火”的思路仍然是“角斗场”的思路；后来在另外场合又再次强调说：毛、刘文革两种指导思想在1966年2月—10月表现为毛、刘直接对立。

对立也好，对抗也好，角斗也好，点火灭火也好，其实仍然是“两条线”的思路。“两条线”的官方语言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我看

来，这种看法与说法就是大谬不然，哪有什么“两条线”，十年文革从来都只有毛泽东的一条路线。

既然作者的思路没有变，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角斗场”呢？那样不是更鲜明、更生动吗？

这里又有一个过去的细节需要回顾。

2013年，当《良知的拷问》还没有正式面世前，老杨的这篇文章还在内部讨论之时，笔者就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的意见稿，并由《拷问》一书的编者孙怒涛转达了我的不同意见。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转达到了的，不过没有收到回应。

那份意见稿近2000字，已经比较完整。2015年，我在原稿基础上作了一些充实，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共识网》上，老杨也是《共识网》的读者与作者，想必也是看到了的。下录为原文，略有修改与注解。

二、胡鹏池：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

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为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所写的“序言”《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杨学长进一步发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杨学长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是为了推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来对抗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既然毛刘已经形成角斗，而且还是刘少奇先出招，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从逻辑上讲就是合理的。

所以，这一命题的正确与否，关系十分重大，涉及对整个文革的分析与定位。

笔者认为：如果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必须以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

- ① 毛刘互为对手；
- ② 毛刘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

只有这样才能斗得起来呀！

先考察第①个条件：毛刘是否互为对手？

无论是在文革前的人们认识，还是在文革中与文革后所披露、挖掘出来的大量史料，人们都不可能得出“毛刘互为对手”的结论；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老百姓的感觉都只能得出“刘是毛的助手”的结论。

刘是毛在1942年春，为了开展“延安整风”而特地从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岗位上越级提拔起来的。“延安整风”以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名整了众多党内有位大佬，同时清算了包括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认了党内始终存在着一条从来正确、一贯正确、唯一正确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命题，进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这整个过程中，刘少奇始终是毛泽东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助手。

“七大”后直至建国后，刘的地位虽然延续了上升的势头，但“助手”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即便是后来当了两届“国主席”，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体制下，“国”是“党”领导的，所以“国主席”仍然是“党主席”的助手，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一国两君、一山两虎”的局面。

刘与毛的建国理念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大方向仍然是一致的。在大局方针上，刘始终追随着毛；虽然受到过毛的多次批评，但并没有不服从的表示，更没有在背后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凡毛明确表态后，刘总是服从与紧跟的。

俗话说“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事事、时时、处处与毛完全一致。客观公正地说，在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这方面，刘少奇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做得比他差的人有的是，做得比他好的人也许只有一个周恩来，可那也是在后期。

刘对毛的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虽然有，但有意见不等于会反对；刘在受到毛批评后也不见得没有怨气，但有怨气也不等于有怨言；从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看，刘少奇基本上连怨言也没有，公开场合没有，私下场合也没有。刘少奇是守纪律的。

所以说“毛刘互为对手”是不成立的。

再考察第②个条件：毛刘双方的力量对比。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众所共识的是刘与毛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匹配的。

虽属两主席，一是君来一是臣，“君为臣纲”，虽说是二十世纪了，虽说我们这个国家也叫做“人民共和国”了，其实也正如毛泽东一言道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

所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既不是双方角斗的必然结果，更不是“刘少奇先出招”的合理结果，而是毛泽东单方面的行动。

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打倒刘少奇的？

这就有各种说法，各种分析。有人认为早在建国之初，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据；有毛泽东曾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为据；有人认为起意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情结”或“斯大林情结”为其心理分析。

所谓的“赫鲁晓夫情结”是怀疑谁会在身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所谓的“斯大林情结”是担心身后会不会像斯大林一样遭批判与清算。

其实这两个情结是指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只有毛才具有，别人不会有，连“有”的资格也没有。所以毛才会经常说、不断说“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正睡在我们身边，正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

从有据可查的资料分析，毛对刘的严重不满是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开始的；又隔了两年多，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才开始有所行动，有所布置，其起动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组织写作班子批《海瑞罢官》。

正因为此，所以毛泽东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才开始的，而认为是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毛自己既清醒、又自信地估计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与刘根本不是处于一个数量级别，所以才会当面对刘说只需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那种口气与神态对自己充满了自傲，对刘则充满了轻鄙。

话虽这样说，毛在一旦付诸行动却要谨慎得多。刘毕竟与“彭罗陆杨”不是一个数量级，不能象打倒“彭罗陆杨”那样简单；何况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国主席”，又当了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几十年的接班人。打倒是不难的，难的是如何向中国人民与世界舆论进行“无缝解释”？如何向历史交账？

毛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历史。“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他喝令不了历史。他虽然不怕人们说他是秦始皇，但内心深处仍然盼望人们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才实在是一件大难事。所以毛不仅需要寻找机会、抓住机会，还需要制造机会；更需要制造口实、制造理论，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烂事”搞得神乎其神，似乎真是为了“反修防修，百年大计”崇高目的似的。

毛为发动文革所做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为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这个目的。

直至1966年5月，毛泽东终于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初，毛抓住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写了一张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了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将几年来密谋策划的“打倒刘少奇”这件事办成了。

诚如“一个小指头”所言哉，打倒刘少奇，只花了两个月，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却化了八年也没有能完成，直至死也没有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最多也就是似信非信，而历史早把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所以说，从文革前的态势及事后的结果看，刘都不是毛的对手，刘在毛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但刘也没有叩头倒蒜、屈膝投降，只是一副“死猪不怕开火烫”模样。

不是对手，哪来的角斗？没有角斗，哪来的角斗场？更没有所谓的“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的问题。并不能认为刘少奇派了王光美到清华工作组就是什么“先出招”了，这个前提条件是很不充分的，杨提出的这一命题只是他认识及表达上的误区。

三、钱理群：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虽然《天翻地覆》一书中没有出现“清华是毛刘角斗场”，不过杨的这个观点影响还是不小，尤其是被看过《良知的拷问》的北大钱理群教授看到了，钱教授本来对清华文革毫无感性认识，也许是先入为主，居然全盘接受了杨的观点并加以运用与发挥。

2016年某月，电子期刊《记忆》第170期全文发表北大教授钱理群的《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钱文共分四大节，第一大节标题照抄杨文，赫然就是“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这第一大节的第一小节的标题与内容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

谁都能看得出来，钱文的思路正是杨文思路的自然发展。

既然杨继绳定义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毛一方，刘一方，两军对垒，进行角斗，那么各有各的开场锣鼓，各有各的中军大旗，各有各的队伍与拥趸，全都成了

合理想像，钱理群的“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笼了，接下来又在“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为“三种政治”。

四、关于钱文的讨论

2016年10月，钱理群的文章一出来，立即引起以孙怒涛为群主以清华校友为主要群友的某微信群的热议。讨论的成果也发表在第174期《记忆》上。

（一）孙怒涛对钱文的高度评价及对校友的贬抑

孙怒涛首先说：

●钱理群教授的长篇大作以清华文革为案例，对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特别是群众政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将整个清华文革置于这个新的维度中，以严密的思维，开阔的视野重新给予梳理和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

●这是一篇有关清华文革的重量级论文，以三种政治形态的大格局来评判文革并给文革进程一个比较合理的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这是钱文的重大意义所在。

●以三种政治来审视清华文革这个典型，不仅得到了相当完美的解释，而且，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赋予了全新的有趣的含义。

●钱先生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经历，却能写出这样一篇对清华文革有着深刻理解和透彻分析的大作，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全国文革的大局观。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的视野来解剖清华文革这只“麻雀”，就能精准把握。

孙怒涛高度赞赏钱，不忘同时高度赞颂杨，也不忘同时贬抑清华校友。他说：

●他在人文学科上的深厚学养，也是我们这些精于技术的工程师所远远不及的。虽然他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现场，却也因此没有派别情感和人事瓜葛，倒成了非清华人评判清华文革的独特优势。

●统观清华老六届写的评述清华文革的文章，只有杨继绳的《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一文（即拙作《良知的拷问》一书之序言）可与钱文相媲美。

●对文革反思研讨的文章，如沈昆、陈中平、张比等校友写的都很不错。但有一些校友的文章只能算是议论文，连形式上都不够论文的规格。

（二）杨继绳对钱文的高度评价及对校友的贬抑

●这是写清华文革最好的一篇文章。近几年清华人写了大量的回忆、反思文革的书籍和文章，看来钱先生读了不少。他把清华人的这些著作提炼了、升华了，浓缩成了有历史事实、有理论分析、有思想深度的一篇宏篇巨制。

●我觉得钱先生对毛、刘文革指导思想的实质性归纳很到位。这两种指导思想在1966年2月-10月表现为毛、刘直接对立。刘倒台以后表现为毛与军政官僚集团的对立。由于科层制（即官僚制）为管理社会所必需，所以，毛发动群众砸烂旧的政府机构以后，没有制度创新，只能向官僚集团妥协，回到文革前的制度。

●钱先生提出了一个分析文革的新框架：-----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独裁政治——群众政治——官僚政治’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文革的基本内容，并构成了文革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为了和官僚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可以给群众政治以相当的发展空间，这样的发展也并非没有意义；但一旦他要回归官僚政治，向其妥协，也随时可以扼杀群众政治：清华文革，以致整个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始放终弃的过程。”钱先生在文中对群众政治作了深入的分析，很有价值。不过，钱说“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我觉得用“个人独裁操纵群众政治”比较合适，“结合”的双方是平等的，不能一方跪拜在另一方面前。毛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

杨继绳也象孙怒涛一样，一边高度赞扬钱理群一边批贬抑清华校友：

●近几年来，每次清华人集会反思文革，我都建议不要纠缠在武斗中谁是谁非的细节，着重挖掘清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和上层政治斗争的关联，要把清华文革放在全国文革的大

背景中，放在高层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中。但“身在庐山中”的清华人还是难以跳出对细节的纠缠。钱先生的文章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我虽然写了《从清华看文革》一文，但写得不深，钱先生的文章真正做到了“从清华看文革”、“从文革看清华”。

（三）蒯大富的同班同学王大定的评价

不少人一片叫好，我对钱的文章不那么看好。这位没参加过清华文革的先生侈谈清华，造出了“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群众政治”三个政治说法，说这三种政治在清华决斗。

关于“群众政治”我前面已经说了，是没有的。又翻开了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66页，写到7月7日马力见蒯大富，我认为就是一个暗示；写到7月22王力、关锋看蒯大富（没写二人说了什么），我认为就是得到指使，被毛拴住了。

说“独裁政治”，刘少奇不是独裁政治吗？邓不是独裁政治吗？那个官僚不独裁？蒋南翔不独裁吗？

说“官僚政治”，毛是头，是第一个，是他建立了官位制，在他的指挥下官僚们压迫和掠夺百姓。

所以，区分成“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是无稽之谈。

其实文革就是毛要把刘搞下去的一场恶斗。毛刘既有权力之争，也有路线之争。权力之争，要建立家天下，刘的第二把交椅早晚要撤，是时候了，再不撤，怕被刘拱倒，传不成家人了。路线之争，例如公私合营的进度有分歧，对社员的控制程度有分歧。

为什么要同时打倒那么多的干部？我认为，毛是报复。七千人大会毛做了检查，丢了脸，看出多数干部认同刘。毛要重新建一个队伍（不过，最后没成功）。

毛为什么把清华作为第一战场？因为工作组整学生可以作为把柄，蒯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

比较钱的文章和杨继绳学长的文章（或谈话），钱没有杨学长的深度，没有杨学长叙述的明白。钱的文章说了三股力量。其实，平民的力量，后来转化成了争权夺利，清华的团四，其实是两派争权。各地造反派无不分裂，都是争权。这里面没有出一个有政治家的人物。

（四）两位外校学者李海文与朗钧的点评

李海文（北大校友、党史专家）：

钱文涉及到理论，而不仅是一般历史叙述。文革前是否是官僚政治，文中对此没有论述。这涉及到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否正确。也就是对文革是肯定还是否定。另外也没讲造反给国家带来的后果，人民幸福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既然涉及理论，就要讲出其所以然。写文章在逻辑上要自圆其说。这是我一直不明白的问题。理论成为完整的体系才称得上理论。其基础是概念，并对概念有确定的、正确的定义。如果拿几个名词套用、解释历史。学术界这个情况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请教：什么是群众政治？建国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是不是？美国的工会参与的政治是不是？在野的国民党是不是？政党政治与群众政治有无区别？……

朗钧（外校朋友、学者）：

钱文最大的问题是“群众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拔高文革。1957之后还允许“群众政治”出现？尤其是文革？

“群众政治”提法并无新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文革”说的另一种表达。而“人民文革”说是从“两个文革”说中推演出来的。其倡导者是王希哲、杨小凯、刘国凯，还有郑义。

判断“群众政治”在文革中是否独立存在过，主要看其政纲或口号是否有别于“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的纲领和口号。以清华为例，老蒯团派的政治诉求是“彻底砸烂”，

而这个“彻底砸烂”源于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更早的表达是在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虽然刘（涛）贺（鹏飞）红卫兵与蒯红卫兵势如水火，但如果刘、贺红卫兵掌权，也跳不出“彻底砸烂”的框架。1971年迟群、谢静宜搞的“两个估计”就是“彻底砸烂”的官方表述。“两个估计”的本质就是将毛搞文革的初衷之一落实到实处。（钱文没有提及“两个估计”与“彻底砸烂”间的关系，或许是疏漏）仅此上述一例可见，在清华文革中，“群众运动”是有的，但“群众政治”是莫须有的。

（五）我对这些“评价”的评价

我不在这个群中，没有机会发表即时评论。我注意群友评论的派别倾向非常明显，当年的团派校友一般都对钱文持赞赏与肯定的态度，当年的四派校友一般都对钱文持否定的观点。当然有很重要的例外，杨继绳、孙怒涛两位是当年的四派，他们对钱文高度肯定、高度赞赏，而蒯大富的同班同学、同为早期造反派的王大定当年是团派，然而他对钱文的批评直接而朴实，在我看来就是很真实的。

校外学者李海文的点评很简短，却将问题问到了根本上。

（1）“三种政治”的理论是对文革肯定还是否定？

（2）造反的后果，人民的幸福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3）理论成为完整的体系才称得上理论。其基础是概念，并对概念有确定的、正确的定义。如果拿几个名词套用，解释历史。必然就会随着时间也流逝。

另一位校外学者朗钧的点评也很简洁，却点明了“三种政治”的实质：

（1）“群众政治”是拔高文革的提法；

（2）“群众政治”的提法了无新意，不过是“人民文革”说的另一种表达，而“人民文革”说是从“两个文革”说中推演出来的。

五、杨继绳、钱理群的激进造反派情结

从对钱文的议论、评价中，不难看出在文革反思领域中存在着派别规律性。

（一）郭建的启发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郭建《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使我对文革反思中的派别规律性有所认识。文章说：

能否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静地反思造反的正义性问题，这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挑战。在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如官僚集团、旧政府官僚、官僚阶层、官僚阶级、旧官僚等），“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我觉得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有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之嫌。

郭建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将“走资派”概念偷换成“官僚集团”的往往是一些有文革造反背景的研究者。郭建还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两种原因：

一是心理原因：当年曾经反对“走资派”，现在不好意思再说这句话了，于是改口说自己当年反对的是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

另一原因：可能是一些造反派学者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如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西方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所以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

（二）杨、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造反派学者呢？

郭建所指有没有包括杨与钱？我们无需确定。可以确定的是杨、钱二位正是将“走资派”偷换成“官僚集团”的学者，于是我就怀疑他们是否也出于这两个原因。

显然杨是看过吉拉斯的《新阶级》，他的书中就多处引用了吉拉斯的话，钱有没有看过呢，这也无需去猜测。

至于他们是否具有造反派心结呢？那倒是有迹可循的。

钱理群坦言道：“在文革中我虽不在清华，但也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而且是一个自始至终参与其间的激进派。”（原话）文革开始时的钱已经从北大毕业了，分配在贵州。贵州有什么激进造反派呢？那里有一个“贵州411”，是很出名的激进造反派。

至于杨继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文革中参加的是414。在清华团、四两派中，“激进造反派”的桂冠非团派莫属，414是一个温和造反派。即使是说温和造反派，也是414自说自话，老团并不承认老四是造反派，咬定老四是“反革命变天派”。在1968年7月17日至19日召开的“清华—北航黑会”上，激进造反派说414是“老保翻天”。在1968年的“728召见”时江青说“414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毛泽东说“414是反对我的，我才不高兴那个414。”

老杨是一个什么样的414呢？在对钱理群文章发表看法时，老杨坦露心怀说：

对《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看法。钱文说：“四一四思潮的内在逻辑就自然通向了十七年的官僚政治。”“414派基本上是一个‘十七年派’，即主张回归十七年的官僚政治”，打出了一个‘全面恢复十七年体制’的旗帜，也就事实上取消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完全同意钱先生的这一看法。-----

请看当年我的日记。

1967年12月14日：

“我是一个站在414营垒里而不为414英勇奋战的人。其所以站在414营垒是因为去年8月的战友都在414里，那时我们在一起为反抗工作组和‘伪三临’而战斗。为什么不为414英勇奋战呢？因为对414的一些观点我不能接受。为此我曾同周泉纓（杨继绳的同班、同一个战斗组的同学，414的总部委员、《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主要作者）吵过。”

“当前争论的实质是：对清华过去17年怎么看？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团派认为黑线为主，414认为对过去17年要基本肯定。我认为清华过去17年的组织路线和教育路线是应该否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团派一边的。”但是，团派说我右倾，我不可能靠近团派。我在团、四之间摇摆是因为我困惑。

1967年9月6日日记：

“一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1，过去 17 年怎样估计？是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吗？

2，干部问题：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凡是第一把手都被打倒？这些人都是坏人吗？如果过去 17 年主席路线占统治地位，那这种路线是谁去贯彻的？为什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实际情况有如此大的出入？为什么这篇文章的精神与毛主席对北大“6·18”事件的态度相矛盾？

3，阶级队伍、阶级路线问题：在中国是否形成了特殊阶层？17 年来我国阶级关系有何变化？为什么出身好的保守多，出身不好的造反多？”

（三）杨“文革日记”和对钱文“完全同意”反映了什么？

老杨在文革时就有较多的思考。他当然是能想问题的，因此才有内心的焦灼与矛盾。而且他与周泉缨（文革中著名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在一个班、一个战斗组，两个人都是善于思考的，但两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思想方法更不一样。

老杨参加 414 是随班上“反临筹”的大流，而他的观点是“站在团派一边的”（原话）。可见文革分派的现象是复杂的，团派观点的老杨参加了四派就是一例。

老杨的主要观点是：文革前的清华 17 年的组织路线与教育路线应该否定。老杨自己说这是团派观点，的确这也是团派观点。当年团派对这一观点表达还要激烈得多。414 通常将团派这一观点归纳为“彻底砸烂旧清华”和“大翻个儿”。其中“大翻个儿”并没有明确的出处，但“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观点团派自己也从不回避，而且影响深远而广泛，连毛泽东都知道。

老杨不同意《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这期“社论”认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革命的要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社论还认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正是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红旗 13 期社论的观点正是 414 立论、

并最终形成派别的基础。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尽管在组织体系上是老四，但在思想体系上真不是“老四”。

老四队伍里有老团的观点；老团队伍里有老四的观点；这种现象很正常，也很普遍。

但当年的观点会影响人们的后续思维，尤其是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更是如此。

六、也谈对“清华两派”的认识

作为北大教授的钱为什么不去谈北大文革，却大谈特谈他更不熟悉的清华文革呢？

他坦言道：“因为清华有414思潮，更有代表性，而且清华人对文革的反思，似乎比北大更深刻。”

显然钱的注意力集中在“414思潮”，并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看法：

“四一四思潮的内在逻辑就自然通向了十七年的官僚政治。”“414派基本上是一个‘十七年派’，即主张回归十七年的官僚政治”，打出了一个‘全面恢复十七年体制’的旗帜，也就事实上取消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杨继绳强调说：“我完全同意钱先生的这一看法。-----”

（一）沈如槐与陈楚三的《回忆与思考》

2007年，414的头头沈如槐与陈楚三联名发表网文《回忆与思考》，对“414思潮”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与系统的总结。我估计钱理群很可能没有看过，故简单介绍如下：

- 1、团四长期论战，归根到底只有两个主题：“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
- 2、关于十七年：四派主要观点是“红线主导论”与“阶级关系不变论”。
- 3、关于文化大革命：四派主要观点是“部分改善论”。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彻底改善，而只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大翻个儿”，不是“彻底砸烂”

4、当前的文革形势与任务（指1967年年中后）：应该转舵与收尾。

我们从中可看出其逻辑：

●既然是“红线主导论”和“阶级关系不变论”，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必要的，必然导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既然是“部分改善论”，那么极“左”思潮就是错误的，坚决反对极“左”思潮成为414最鲜明、最独特的理论旗帜；

●既然是“红线主导论”和“阶级关系不变论”，回归就是回归“十七年”；

●既然是“部分改善论”，回归就不会是全面的。

看了沈、陈的《回忆与思考》，再去看钱理群对“414思潮”评价的那段话，会有进一步的理解。

（二）414 仍然是错误路线的产物

正如《回忆与思考》中的叙述：414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左倾理论下的产物。414所坚持或主张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许多实践活动也是“左倾”错误理论、错误路线下的实践。

在校内，414不仅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还批斗右派分子，甚至批斗持不同观点的普通教师；在社会上，414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喊“打倒刘邓陶”；还有少数群众参与了几大极“左”事件。

从政治观点上看，414思潮从“红线主导论”到“阶级关系不变论”，从“两小撮论”，到“十七年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等，都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的反映。

尤其是414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看不到这些运动都是在毛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错误运动；看不到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设；

更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

所以 414 思潮本质上仍然是左倾思潮，414 反“极左”本质上是以“左”反“左”；以“小左”反“大左”；以“左倾”反“极左”。

（三）414 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414 与团派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产物，都是错误的。

414 的理论与实践都是错误的，错误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414 对文革当然有反思，从相对意义上讲，414 对文革的反思超过了文革中的任何群众组织及群众组织的内部派别，从绝对意义上讲，414 对文革的反思仍然是十分肤浅的。具体的说：414 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左倾理论、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根本不可能认识治国治党都必须进行民主法制建设；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尽管如此，414 与团派斗争的实质也并不是以造反派内部的斗争所能概括的，也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所能解释的，也不是 50 步与 100 步的关系，我错你也错，大家都是错，横竖一个错。414 与团派的斗争不是徒然无效的斗争，不是没有意义的斗争，而是文革中两种前途的斗争。

414 代表了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反映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的善良愿望与迫切愿望。

这一愿望既是基本愿望，也是根本愿望；既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又是一切革命的初心，也是一切治国之根本。

414 存在的现实意义

414 的存在不仅有力地阻止了，而且彻底地葬送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的“一统清华梦”。

如果让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如梦以偿，整个清华就将全盘划入“四人帮

集团”的势力范围，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马前卒、铁拳头，将会发挥更多、更大的坏作用。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他们个人而言都不好。

414的存在不仅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进步、正义、务实力量保存了清华的半壁江山，而且让他们看到了这股社会力量坚韧的战斗力，增强了他们在高层斗争的信心。反之，414这股力量也受到了他们的珍惜与保护。

414存在的历史意义

文革是中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偶然而必然出现的一头凶恶的怪兽，它所吞噬的不是污泥浊水，不是邪恶与丑陋；恰恰相反，它所破坏的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需具有的秩序，它所吞噬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及人类的善良与良知。

在这头怪兽的屁股上加上一鞭子让其继续向前撒野作恶，还是迎头给上一锤子阻尼、减弱它的破坏力，效果当然不一样，历史的定位也当然不一样。

今天看来414的“红线主导论”当然是十分片面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恰恰是这个“红线主导论”却是给了这头怪兽的当头一锤子，与此伴随的“回归论”、“叫停论”、“转舵论”、“五个正确对待论”都是阻止这头怪兽向前撒野狂奔的力量，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分子作为中央文革的马前卒起到则是为这头怪兽继续撒野作恶的力量。

如果以文革为参照物，四派力量就是负能量，而团派力量则是正能量；

如果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物，文革的力量本身就是负能量，阻止文革的任何力量都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负负得正，414正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这就是414存在的历史意义。

（四）激进造反派学者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关于414对文革的阻尼作用，杨继绳也是看得出来的。他说：“毛泽东支持蒯大富，

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

老杨虽然感觉到了，但他仍然只在意周的“紧跟”，而忽略周的“斗争”。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只能由老杨自己去找原因。

蒯大富在530成立革委会破产后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414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

蒯大富的这段话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深深的怨恨与愤懑！尤其是“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这句话，可见他对周恩来的不满情绪至今很饱满。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说：“周恩来在处理清华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与毛泽东存在差异，甚至明显不一致。这种情况伴随着清华内部矛盾斗争，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

韩爱晶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外校人对清华文革的客观评论，也体现了蒯大富的心声。尤其是“伴随着-----直至”，也算是“看透了”。

如何理解周恩来对414的珍惜与保护？因为414的一系列的观念与主张：尤其是反极左、红线主导论与周恩来的观念高度一致。

当我们认识到414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对这些问题都不难解释了。

不能说杨、钱没有思考，但因为他们至今所持的仍然是激进造反派的立场，思考起点不一样，思考方向不一样，所以结论也不一样。

七、本文以杨继绳自己的一段话暂告一段落

本文旨在讨论文革是“一条线，还是两条线？”

杨继绳主张是两条线，钱理群不仅有两条线，而且还有“三种政治”。

其实哪来的“两条线”和“三种政治”？文革中自始至终只有一条线，即“毛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革中的每一次所谓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刘少奇也好，“二月逆流”也好，林彪也好，都不过是在某个阶段对“毛线”有所抵触、有所不满而已，即使文革初期，刘也不过因为处于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地位，按照自己的理解，按照党的一贯传统，也是毛在“反右派运动”中所采用的办法，而绝不是什么为了对抗毛，甚至什么“先出招”。

杨继绳自己有过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文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 3500 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共是执政党，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我很赞成老杨的这个判断。

但是这段话说的是文革结束时，所以请老杨与广大读者一起想一想：十年文革中，甚至文革前，尤其是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不早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吗！■

【评杨钱书】

对谈钱理群先生的“文革观”

小 鹰

甲：最近钱理群先生这样论述文革初毛、刘在清华的“角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的

模式和官僚政治的模式。”（《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记忆》，170期）

我看，这种说法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好像刘少奇派了工作组，便是维护“官僚政治”，而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倒刘，却是要反旧有的“官僚政治”？似乎其好心仍是要寻求“变革”？“独裁政治”对“官僚政治”——难道这就是“文革”的矛盾所在吗？

乙：我同意你的看法。钱先生的文章割断了文革与十七年路线斗争的历史缘由，只看在“清华文革”那一段时期的现象，仅根据是“派工作组”还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点，就对毛、刘下断言，以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毛定意打倒“走资派”刘少奇，是他发动文革“积蓄以久”的原因；而他在派“工作组”一事上大作文章，不过是个借口和煽情的手段。因此，如果单看毛、刘在“派工作组”一事上所谓的“角斗”，那是只看表面现象，“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也就是说，钱先生至今还停留在66年8月的思维里，仍然入了毛先生的“彀”，着了他的“道儿”。

事实上，和“四清”时一样，刘少奇一派根本就不赞成有“党内走资派”一说，他们搞了个“二月提纲”来抵制毛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化革命”。刘少奇其实并不想搞什么“文革”，更谈不上有什么自己对文革的“理念与设计”。但那时无人清楚毛到底要干什么，刘少奇也没有料到毛“文革”旨在打倒他自己。你毛皇帝又要搞“运动”吗？那就和以往一样，再派“工作组”来领导吧！有人要“反党”？那就按你老毛57年的办法，抓“右派”。

甲：正是这样。1966年8月4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董必武副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

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董是个老实人，他的老实话代表了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恐怕也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真实想法。

乙：况且，派“工作组”一事，事先也是按组织纪律“请奏允准”过的，现在你老毛又出来做脸，故作惊讶，大表痛心，令蒯大富等“造反派”棋子“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地成为打手，以死相随。这等“一石二鸟”的暗算，如此低劣无耻的演技，难道钱先生现在看了也还动情吗？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说，刘派对毛牵头“文革”一事，是从“消极抵制”或“想不清楚”，到跟着“揣摩”或“应付”，完全谈不上是“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或“两种模式”的“角斗”。

甲：钱先生提出了所谓“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斗争的说法，试图以此解释文革现象。虽然他也提到“群众政治”，但正如他所说，那只是毛派的附庸或工具，因为在拿掉刘派之后，“造反派”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亡了。但是，他说的“政治”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点“云山雾罩”。

乙：是的，钱先生这里说的这些“政治”，都是些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概念”，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政治”，“政治”，“政治”究竟在哪里？“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内涵到底有什么质的不同？不问建国以来在路线、方针上的斗争，这样空谈“独裁”对“官僚”，一点“政治”内容都没有！“独裁”就不依靠“官僚”啦？四人帮又是不是“官僚”呢？毛泽东骂刘少奇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那1976年四月五日的血洗天安门广场，毛干的是不是“镇压”？是不是“恐怖”？这个恐怖又是不是“来自中央”呢？

甲：钱先生承认：“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政治模式，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不同形式。

在维护一党专政的这一根本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分歧。”

乙：很好，既然“并无分歧”，那我们又绕回到原来的问题：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把刘少奇往死里整？文革中毛泽东曾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钱先生能不能讲清楚，自建国以来，毛、刘有没有过重大的“政治”分歧？如果没有，怎么会弄得非“不共戴天”不可？

甲：钱先生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

乙：但问题是，毛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取代”性的“大实验”呢？我也听到有人说，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甲：我想，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水火不相容”了，才要“大动干戈”。什么是“政治”？“政治”者，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是也，是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也。“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乙：对！现在许多人谈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总是以“官僚政治”一言以蔽之，这不免掩盖和歪曲了“文革”斗争的实质。那就让我们来谈谈文革前的“政治”是什么吧？

自六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处处受人抵制，说话已没有人听。在他看来，中宣部是个和他作对的“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部，还有那个“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连身边一个北京市委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阻挠他的“大批判”，整个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指控，农村里在

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城里推行的是“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讲“合二而一”，文艺上提倡“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因而毛泽东确信，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毛岂容党内有两个发号不同命令的“司令部”？所以他才要“清君侧”。“清君侧”清的就是“异己者”和“绊脚石”，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甲：是啊，你说的这些事，现在许多人好像都忘记了。钱先生割裂文革与17年历史的关系，不探求“异己”异在哪里？不追究“绊脚”绊在何处？这样不谈“路线斗争”，不问“是非对错”，只纠缠在“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形式之争，又怎么能搞清楚“文革是什么？”、“文革从何而来？”等问题呢？难道上述毛泽东的那些指控，都是旨在“反‘官僚政治’”吗？

可是，另一方面，刘少奇也的确从来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

乙：不错，刘少奇是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但刘少奇信守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缔结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他和一些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等，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也比较尊重，善于聆听和团结他们，又有民主协商的精神，不像

毛泽东那样专横霸道、目无他人。而另一方面，如钱先生所指出的，在毛、刘“影响下的两派的主流(即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一党专政(党的绝对领导)本身也并无怀疑”，“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刘少奇那时要是公开反对了，毛泽东就不用称他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不用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直接送进“秦城”就好了；而任何“造反派”胆敢这样想，也立刻会被同类“砸烂狗头”，并扭送“专政机关”。

现在有人却以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倒刘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研究文革，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毛、刘建国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何在？看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路，总得一步步走，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废除“一党专政”，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如此脱离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强求前人是应该的。

甲：可是现在不少人就是指责刘少奇“不反体制”——而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你不能反驳吗？所以我说毛、刘都一样，甚至毛比刘还强些，毛至少还反了“官僚”体制。他失败了，虽败犹荣，还是个和百姓同在的“英雄”。这也就是秦晖教授所说“但刘(少奇)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的意思。也正是由此，他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歪曲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难道秦教授就真的不明白，我们上面说的那些事，谁“左”谁右吗？

乙：这些指责人的人，他们似乎都是“改革派”，都愿意中国繁荣又民主，但他们公然宣称过“反体制”了吗？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了吗？我想也未必。彭德怀和张闻天，胡耀邦和赵紫阳又算不算是“反体制”人物呢？或者，他们也都是“官僚”？现在主张实行“宪政”，主张“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的人呢？

甲：平心而论，从刘少奇到胡耀邦的时代，以至到现在，企望要有个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掌管全中国，恐怕还不现实。党内外的明智改革派的斗争才是希望，如果把他们一概斥之为“拼命维护体制”的旧官僚，是不是有点太“左”了？

乙：是的，这种不做区分，把一切人都骂为“官僚”以拒之的态度，实在是要害死人。二十多年前，“左派”学生领袖听不懂总书记赵紫阳的呼求，不知进退，一味拒绝合作，结果党内“保守派”占尽上风，广场血流成河，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或赶出国门。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当吸取吗？

甲：文革时遗留下来的这种“唯我独‘左’”的毛式思维方式，到现在还很流行，而它与“民主化”的精神及“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刚好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人还没上台，往往就已经在不择手段地打压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了。难道他们来掌权，就不是新“官僚”啦？

乙：看来，在这些当年自己“奉旨造反”的人的眼里，只要刘少奇不“反体制”便算不得好汉！因此，我造你刘少奇的反，就是造了“官僚”的反。这逻辑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啊！

但是，如果一定要用“反体制”这个词，那我认为，刘少奇在1951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他敢讲“资本家‘剥削有功’”，敢有批示“反对农业合作化”，且指出“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体制”，即反对毛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或“体制”。这是毛、刘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甲：可是刘少奇最终也是要搞“共产主义”的，不是吗？

乙：是的，他不是华盛顿。但如果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毛泽东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也正在于此。刘少奇若能这样想、这样做，至少是开了条路吧？如果刘走不到底，党内还可能有的类似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开明领袖啊！

甲：这倒也是。你知道吧，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 1951 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 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 1960 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

乙：除了我国农村在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甲：这样看来，如果封建专制的中国能够按照马、恩所说的，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先搞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乙：是的，这三件事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首先要成为高度和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有资格来谈论以后的事。

可是，当年又有哪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怀疑过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呢？有谁曾想到过在生产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吗？甚至那怕只是稍微考虑一下“不破坏私有制”等大胆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很少，所以

难怪到现在还看不出毛、刘的差别！

甲：啊！是先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物质条件，还是不顾一切地搞“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混成物？原来这就是毛、刘道路的差别！

乙：现在有人根本看不懂这里的对立，却肤浅地把文革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说成是“独裁”对“官僚”的关系，对毛、刘各打五十大板，貌似非常公平和彻底。其实，“独裁”又怎么样？毛泽东历来承认，并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自己就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官僚”则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如此一来，在一般人听来，毛反倒比刘还好一点，似乎毛有“正气”，一副“帝王相”，他痛恨“官僚”，痛恨“资产阶级”，出发点还是个“善”字；相比之下，按他们所说，刘则像是个“猥琐不堪”和“祸国殃民”的佞臣贼子，形同“过街老鼠”，令“神厌鬼憎”，其中的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可怜，某些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现在还在替毛打工效力，拼命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泽东和自己的头上。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

乙：一点不错！这种“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进而他恐吓人们说：你们瞧，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做官当老爷”，叫你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许多贪官“认罪检讨”时，也总是说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甲：其实，他们干的事，自古以来，还没有“资产阶级”时就有了，是“封建特权”。“贪腐奸淫”的事，无需“资产阶级”来教化，有特权就可以做。而主张“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反的就是这“封建专制和特权”。

乙：然而，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走资派”就是“反官僚”，“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甲：好，让我们再回到“清华文革”。我想，正是这种“概念偷换”不可避免地又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让许多人抓狂的两个毛泽东：十七年打造“官僚政治”并“主导红线”的毛泽东，和文革伊始带领“造反有理”且“继续革命”的毛泽东。

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造反派”因此曾分裂为两派，“团派”强调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414派”则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不容否定，更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匪夷所思”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清华的团、四两派，以至全国众多“造反派”之间，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乙：其实，这“悖论”之解在于：建国之后，只有一个毛泽东，一个刘少奇，他们背后有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甲：所以，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毫无意义，

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乙：这也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甲：最后，那你认为，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乙：钱先生撰文讨论了“文革时期群众政治与国家、政党高层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群众政治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阅读该文对于理解一个极权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以及如何认识群众运动中的“民众”本身，都很有教益。

如果进一步跳出“文革”的圈子来广义地思考所谓的“群众政治”，那么，清华文革的实例，对于研究群体政治行为，政客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包括对比中西方国家有关政治诉求、利益冲突、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公投与选举、抗议与示威等活动，均有启示；对于了解某些群众团体与宗教组织在信仰心理、崇拜思维上的短视盲从、急功近利、狂热极端等弊病，亦不无借鉴之处。

甲：还有一点，我以为，钱先生虽然提出了“群众政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这是他与后者的重要区别所在。

乙：是的，钱先生有勇气这样讲真话，的确难能可贵！这很令一些人不爽。遗憾的是，从文章一开始立论，钱先生就把“文革”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独裁政治”

与“官僚政治”的角斗。尽管如此，这种错误的基调并不影响钱文对“群众政治”的许多分析和结论，它仍然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然而，搞清楚“文革”的本质，却可以解决令“造反派”分化的“两个毛泽东”之“悖论”，从而把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引向深入。■

2017年6月

【读书】

中国革命暴力现象再审视

——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崔龙浩

本文摘要：

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共对革命暴力高度的发动力和控制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如何理解中共革命中的暴力现象，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绕不过的话题。在这一点上，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可资借鉴。

平克从人性角度出发，认为其中既有暴力的动机，也有另一些成分推动我们趋向和平。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则往往取决于外部环境，他通过历史考察总结出了利维坦、商业、女性化、世界主义(扩大的认知圈层)和理性增长五种遏制暴力的力量。

借用平克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远较其他近代革命暴烈，在于近代中国是在没有经历理性启蒙，商贸文明又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被迫卷入近代世界。由于饱尝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的欺凌，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心声。同时，内部社会权威全面崩溃，军阀混战，乡土崩坏，社会结构瓦解，形成了共产革命的土壤。两方面的问题使得中国陷入了平克所说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时代，自然要比单一

向度的革命暴烈许多。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烈的至善目的论色彩，使得其很容易忽视手段是否合规、程序是否正义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暴力现象，是我们走出革命阴影，建设美好社会的必要前提。

回顾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贯穿其间的暴力现象无疑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怖身影。即便在取得政权后，中共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着“革命暴力”，其所造成的惨烈后果，不仅由于其取得全国政权而规模扩大，也在暴力程度上更为剧烈。从大革命的烧杀行为，到土改的残酷斗争，再到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暴力批斗和大饥荒的凄惨景象，无不震撼着今人脆弱的神经。而纵观人类的革命历程，“暴力”始终是一个萦绕不去的噩梦。法国大革命以其四十万人的血腥代价，拉开了近代暴力革命的红色帷幕，一大批如《双城记》、《九三年》这样的文学经典，将革命的恐怖身影印入了无数人的大脑。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运动，红色高棉造成的百万级人口非正常死亡，这些暴力行径甚至让人们对于革命的正义性产生了根本怀疑。解释中国革命中的暴力现象，无疑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基于或“激进”或“保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常常陷入相互否定的两个极端。拥护革命者认为，革命是历史进步必经的阶段，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斗争，革命暴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反对者则批评革命不过是一场盛大的乌托邦幻想，完全是人类妄自尊大的产物，极力强调和批判革命暴力、血腥的一面。而分歧的关键，则在于对革命暴力正义性的评价。

一、平克关于暴力的解读

显然，寻求更科学的解释性框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是我们探讨中国革命暴力现象的前提。从这一标艺工作者 准上看，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

什么会减少》虽然没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了科学性的解读。在这本书中，平克探讨了人类社会“暴力现象”¹的总体趋势和影响因子，并提出了“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²的大胆命题——正如导言中钱永祥先生所说，他“正面挑战了近百年来主流思潮不愿也不敢再谈‘进步’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倾向。”为了证明他的这一观点，平克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暴力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并概括出了六大趋势：平靖进程，文明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每一种趋势，都代表了人类在减少暴力现象方面的长足进步。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人性中的暴力密码，提出“暴力的下降使得我们可以放弃人性或善或恶的二分法”³，并结合认知心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揭示了人性的复杂面向：其中的某些成分，如捕食、支配、复仇、施虐和意识形态等，都是制造暴力的动机（他称之为心魔），但也有另一些成分，如慈悲、公平、自制和理性（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称之为“善良的天使”），推动我们趋向和平。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则往往取决于外部环境因素的触发。在平克看来，单纯的讨论心性显然并不能真正地帮助人类社会降低整体的暴力现象，而只会让类似“和平主义者”这样的道德模范们陷入“囚徒困境”，这些“外在”的因素才是我们认识人类暴力现象的关键所在。他在历史考察中总结出利维坦、商业、女性化、世界主义（扩大的认知圈层）和理性增长五种克制暴力的重要力量，实现“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落地，让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放矢。

以追求“片面深刻”的创新标准来说，相比于其他一些讨论人类暴力现象的学术著作，如《现代性与大屠杀》、《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以及平克提到的《杀人》（*Homicide*）

1平克认为，所谓暴力，就是“旨在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实际行为”。在本书中，他关注的暴力主要是对待知觉生物的暴力行为，即谋杀、袭击、强暴、抢劫和绑架，施暴者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组织暴力则涵盖了战争、种族灭绝、刑罚与死刑以及人为造成的饥荒等。

2[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页。

3同上，第558页。

等，本书在理论建构上可能并不“精深”；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当然，这可能是吹毛求疵了，平克毕竟是心理学家），本书在资料运用上也以引用为主，没有什么突破之处。这当然和本书“科普读物”的定位有关，但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平克的问题意识并非针对于人类某时某地的局部暴力现象，而是通过对人类社会暴力现象的整体追问，并最终落实到对人性的判断上。无疑，只有一部综合性的著作才能更好地厘清这个问题：“……让我一再惊讶的是，回顾过去，世界上各个层面的暴力几乎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这就有必要在一本书中结集文献，寻找这些发展在何时、如何并为何出现了这些共性。”¹

当然，这并非说本书在学术上缺乏创见。一部优秀的综合性著作，一定是一个时代观念更新的产物，体现了这个时代人类最新的价值观进步。如钱永祥先生就从公共道德重建的角度出发，认为本书最大的创见在于挑战了习见的高调道德观，把道德关注的核心议题从“追求德行”下移到“减少痛苦”，并启发了我们如何为中国的道德重建“注入真实的生命力”。另外，跨学科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成为优秀的综合性著作的一大特征。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平克却在本书中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生物进化理论中探寻心理密码和历史谜题的答案，用历史考察为心理学和进化理论提供事实支撑，又用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生物进化等增强历史的解释力，这种多学科的综合应用无疑更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问题的看法。

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历史学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可以说为我们探索了一条“历史照进现实”的新路径。在本书中，平克结合在有关心理学的章节探索的人类心智功能，利用有关历史的章节中的历史进展，“在平靖进程、文明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每一种共性指出一种途径，人们循此途径以自制、移情、道德和理性战胜了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²历史是通过具体的人运转的，探讨历史中各种因素对人

1同上，第3页。

2同上，第773页。

性的影响，显然可以为我们厘清现实问题提供巨大的借鉴意义。

从平克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想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暴力现象，单纯的意识形态视角显然是不够的。那么，沿着斯蒂芬平克的研究路径，中国革命中的暴力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在致力于减少人类社会暴力现象方面，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二、解读中国革命的暴力现象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甚至是同属一个意识形态框架的苏俄革命，中国革命的暴力现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和现实环境中找寻答案。

如果单纯以出现国家形态的早晚来说，中国的确可以算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与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的封建社会不同，早在秦帝国时期中国就建立了稳固的中央政权，并在西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基层自治体系。在之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中，虽有短暂分裂和社会失序，但华夏文明基本保持了“大一统”的稳定态势。按照平克的分析框架，相比于全球大部分地区来讲，“利维坦”式国家的建立帮助我们的先人更早地进入了“平靖进程”，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文明进程”¹。可悲的是，我们却长期困于这一阶段。相比于之前人类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时期的暴力水平固然有了极大的降低，但只是相对降低了，如平克所说，可能只是把“凶杀率从百分之几十降低到百分之十几”。而且，专制国家本身就是很多暴力现象的制造者，为了保持绝对权威，专制政府的手段残忍而血腥，“在一个社会中，一旦抢劫和仇杀得到控制，降低暴力的最

1对于中国古代的暴力状况，平克讨论甚少，但在第三章中，他借用埃利亚斯的观点，提出刀具禁忌这一暴力下降的重要标准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说明中国也像欧洲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文明进程。”（第110页）而对自制与移情的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比比皆是，显然也曾达成过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种基于个人道德教化的影响因子，显然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对于个体脱离教化或社会陷入动荡时，这些因素的影响会大打折扣。

大机会就是降低政府的暴力，”¹更遑论改朝换代时的战乱与饥荒。从国家层面的暴力水平来说，即便非常晚近的明、清，刑罚仍是很残酷的，严刑逼供、肉刑大范围的存在，思想、言论管控非常严格，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对待知识分子和思想管控方面）较之前的宋代更为严苛。

对于中国社会曾长期陷于君主专制社会这一独特现象，有学者非常形象地称之为“超稳定结构”。²虽然存有争议，这一论题还是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同并曾引发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无论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超稳定结构”，“文明进程”发育不良的事实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平克看来，“文明进程”需要两个触发器——利维坦和文明商业，³显然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在文明商贸上的成就乏善可陈，商业时常遭遇来自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的双重打击（商业文明远没有宋代发达的明清两朝在专制暴力上却更胜一筹，似乎也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观点）。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方社会暴力状况的“人道主义革命”，更是基本没有在中国发生——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仍不敢宣称在这两个进程上取得了足够的进步。

虽然平克并没有在本书为中国的特殊情况给出答案，但还是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很多启发——比如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西方从“文明进程”到“人道主义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再从这些进程中反观中国，看看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也在很长时间里承受着贫穷、愚昧和权威匮乏的悲惨后果，暴力现象既普遍又残酷。但随着之后商贸文明的迅速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和利维坦政府的成型，“文明进程”也随之加快，为“人道主义革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存

1同上，第192页。

2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3在书中，平克用选择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文明的进程”是如何实现的：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对暴力的垄断，工匠行会和官僚的成长，货币交易取代实物交换，技术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本来各不相关的个体日渐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所有这一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寻求生存和发展，要求人们培育移情和自制的能力，直到它们成为人的“第二本能”。《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第98页。

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识字率快速上升，市民社会也逐渐形成，并终于迎来了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平克认为，“识字和写字率的增长是触发人道主义革命的外生力量的最佳候选因素。”¹阅读帮助人们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增强了“自制”、“移情”等善良天使在人性中的作用，也理解到他人不一定是邪恶的威胁，从而减少了复仇、支配、虐杀等“心魔”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源于迷信的惩罚与杀戮、肉体刑罚、死刑和蓄奴等暴力现象都得到极大遏制。专制主义和国家战争虽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徘徊不散甚至偶尔爆发，但也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减弱了威胁。

也正是在识字率提高以及公共言论空间形成的基础上，启蒙运动带来的价值观更新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以怀疑精神和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启蒙人文主义”强调“普世人性”和个体价值，极大降低了人类的暴力现象。但对于启蒙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套的解释框架——一些学者认为，启蒙运动的理论要对恐怖行为和拿破仑甚至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灾难承担责任。在以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看来，“凡人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根据基本原则设计社会”，“笨拙的胡修乱补只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走向暴乱。”²平克的观点是人类“永远也不该奋起反抗现有制度”的说法简直是太愚蠢了，我们不能否定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但伯克有他对的一面，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政府的行为中，都有不言而喻的文明规范，它们是成功推行特定改革的前提条件”。³如果革命完全无视这些前提条件，妄图“彻底砸烂旧世界”，显然就是走得太远了，这样的现象在中国革命中得到验证，旧世界既不可能被“彻底砸碎”，传统文明规范的崩溃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另一种对启蒙的质疑来自于浪漫主义运动，其特点是否定“个体理性”和普遍人性的存在，强调感情认同和团体属性。平克将军国主义、浪漫军国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国

1同上，第211页。

2同上，第221页。

3同上，第222页。

家社会主义均归为此类。显然，按照平克的观点，中国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这两种“反启蒙”的思想资源，并成为其暴力现象的一大来源。

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情景则与西方颇为不同。从政治层面上讲，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难以真正建立严密和完备的“利维坦”政权，而对于一个合法性建立在“天道轮回”的君主专制政权，又很难获得来自民众的自主认同，正如平克所说的，“一个利维坦只有它的公民感到法律、执法和其他社会规则都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公民才不会在国家权力看不见时，就放纵自己最阴暗的冲动”¹。晚清以后，传统宗法社会又加速崩溃，这样的状况下，社会治理难免漏洞百出。而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一直徘徊在极低的生存标准，随着明代以后人口剧增，生存状况更为恶劣（晚清时期更出现“丁戊奇荒”这样大规模的饥荒），识字率很低。而知识阶层也由于思想管控和缺乏交流，很难形成思潮性的“启蒙运动”。在这样的日益丛林化的社会中，原来用于维护基层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儒释道等主流思想也必然受到冲击。

特别随着农耕社会难以承载的人口日益增多，一部分农民逐渐从宗法社会断裂出来，出现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兵、匪、盗、丐、娼等游民阶层。他们受宗法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较少，又极度缺乏国家（政权）认同，更富于暴力性和不安定性。正如平克所说，“下层社会的人不愿意依靠法律，甚至对法律有所抵触，反而寻求古老的法外正义自助和‘荣誉守则’的行为毫不奇怪”。²“也可以说，历史性的文明进程并没有铲除暴力，只是将暴力推挤到社会经济的边缘人群中了。”³

这样的群体无疑蕴藏了强烈的破坏力量。中国的历史说明，一旦社会结构出现问题，出现大量的游民阶层，常常是大规模民办的温床。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很多其实都是这部分人领导和起到主要作用的，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都属游民阶

1同上，第99-100页。

2同上，第106页。

3同上，第107页。

层，可以说真正出身宗法农民的“起义领袖”少之又少。按照王学泰先生的总结，游民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鲜明的反社会性。游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要求得生存，只有求助于社会动乱，因为社会动乱最容易改变游民的处境。第二，主动进击精神。宗法农民个性是萎缩的，但游民却具有主动进击精神，也更具有暴力性，典型的如《水浒传》中的“好汉”，许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第三，游民帮派意识非常强。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第四个特征：游民没有角色意识，一些由角色衍化出的文明也就消失了，因此显得格外粗暴出格。从本质上讲，游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丛林社会，游民文化就是丛林法则。究其根源，并不是游民本身带有什么卑劣的文化基因，而是社会结构出现严重问题，迫使社会一部分人陷入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致，这种结构失衡在晚清之后更加明显。中国的共产革命中，很大一部分主力就是这批被刘少奇称为“勇敢分子”的社会边缘人，这无疑极大增强了中国革命的破坏力。

而且，这种根植于人性深处“工具性”暴力和复仇欲望的游民意识，通过“俗文化”影响广泛，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温床，而作为其最推崇的带有意识形态萌芽的“侠义精神”，在革命的早期形态中往往大行其道，体现了这一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在“以暴制暴”上的一致性，甚至都带有强烈的追求“公道”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在早期革命文学代笔人物蒋光慈的笔下，革命者往往夹杂了浓重的侠义情结，成为他们投入革命的动力。在小说《少年漂泊者》中，主人公汪中就对土匪头子王大金刚的一段话特别推崇：“现在我们穷人的世界到了，谁个不愿意眼睁睁地饿死，就请同我一块儿来！我们同是人，同具一样的五官，同是一样地要吃，同是一样的肚皮，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当饿死，而有钱的人就应当快活享福呢？”¹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萌芽的对“公正”的原始追求，是千百年来激起社会变动的重要动力。在共产革命中，这种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暴力的强烈效果。

¹蒋光慈：《少年漂泊者》，载《蒋光慈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饱尝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的欺凌，虽然被迫卷入了全球商贸体系，商业文明有所发展，却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作后盾。同时，社会权威组织面临全面崩溃，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欧洲中世纪权威崩溃的困境，上层军阀混战，基层乡土社会崩坏，大量政治性的“恶霸”、“地主”出现，赤贫阶层剧增，社会结构出现严重问题。

两方面的问题使得当时的中国陷入了平克所说的“民族主义时代”和“意识形态时代”的杂糅，其中暗含的两种“反启蒙”思潮使得中国的“启蒙运动”还没开始，就被宣告过时。当欧美大部分国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都在着力消除平克所说的“部落主义心理”、反思民族主义思潮时，中国却还在建构民族国家的路上举步维艰。这样的社会土壤，使得中国的革命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革命，也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权威重建的重任，政治革命夹杂着民族解放和社会重建，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国革命的暴力性。

反过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并非无本之源，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也的确成为马克思主义滋生的深厚土壤。基于生存诉求的对平等的追求，而不是基于发展诉求的对自由的渴望，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目标。依阿伦特之见，法国大革命后期，贫困成为革命的触媒，“贫困是卑贱的，它把人们置入身体的绝对指令之下，也即是需求的绝对指令之下。正是受这种需求的支配，大众汹涌求助法国革命，鼓动着它，驱迫它前行，直至送革命迈向它的毁灭，因为这大众就是穷人的大多数。”¹从此革命的目的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人民的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向“短裤党权利”的过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转挟，也是随后一切革命的转折，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²无论是在建立强势国家上，还是实现社会平等上，中共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显然要比组织涣散又偏重自由价值的国民党更符合要求。换言之，中共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在当时的中国对革命暴力具有极大的煽动力与掌控力，这也成为中共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¹Hannah Aer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Classics, 2006, P.54.

²Hannah Aer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Classics, 2006, P.55.

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没有经历理性启蒙，商贸文明极不发达，这些问题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讨论中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但却很少有人从暴力的角度，来观察这些因素对于人性走向的实际影响，反思它们通往血腥的一面。当然，历史地看，我们仍然能够得出和平克相似的结论：相比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和大规模民变，共产革命在暴力方面显然还是有了很大进步的，既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屠杀平民和战俘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民间的暴力现象，维持了社会的大体稳定。在建政之后，随着强势政权和社会权威的重建，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大为改善，一些日常的暴力现象，如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如妇女裹脚、买卖妇女儿童）、弃婴溺婴等现象的确在减少。即便单纯从道德层面来说，中国的共产革命也是具有正效应的：对于底层民众痛苦的揭露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保障底层权益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议题，并影响至今。

但正如上文所说的，专制国家本身就是暴力现象的重要生产者，现代集权国家作为仍具有很强专制性的政权，具有更严密的管控力和更强势的暴力机器，对内严加管控，对外严加戒备，也成为暴力现象的主导者甚至是垄断者。尽管独特的历史土壤和现实困境，都要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暴戾负责，但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暴力现象，主要还是由意识形态因素激发的。平克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其一些深刻的分析也的确值得我们注意。鉴于意识形态的复杂面向，只有更好地理解它，了解它形成的真正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中当然包含很多“善良天使”，这也使他更具诱惑力），才能真正认清它的面目，吸取它的教训，又不会矫枉过正，谈之色变。

在平克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是造成人类暴力现象特别是组织性暴力的重要因素。他提出，“人类中的个体从来不缺少动用暴力的自私动机，但是历史上那些尸横遍野杀人如麻的暴力记录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大量的人口追捧一种意识形态。像捕食或工具暴力一样，意识形态暴力也是达致目的的手段。但是，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的，即

实现最大的善。”¹而它之所以危险，则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所许诺的终极完美不允许真正的信仰者接受任何折中；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不惜任何代价；敌方的意识形态是彻底的邪恶，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而且，它一旦被内心狭隘、充满仇恨、狂热的人所掌握，便会以无法遏制的趋势走向另一个罪恶的极端，暴力借由“革命”而变成了野蛮的原始本能发泄的出口。²

然而，意识形态却是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实际上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一种思维方式。平克指出“人类认识的前提使我们有能力进行长链条的手段——目的推理，我们因此能够为了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而选择不愉快的手段。……当为了实现宏大的目标而不惜使用伤害人类自身的手段时，目的论就变得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支配欲和复仇欲，我们本质化其他团体，特别是将他人妖魔化和害虫化的习性，我们有弹性的同情心，以及我们夸大自己的智慧和美德的自利偏向，都会鼓励手段——目的论沿着危险的思路推理。”³

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一种具有强烈乌托邦情结的、基于手段——目的推理的意识形态。而在中国这样缺少反思、质疑精神的国家，他又往往容易被全盘接受，不断走向极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意识形态政权往往都是在掌权以后，制造了更大的暴力。

围绕马克思主义与暴力革命的问题，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唯一的本质的手段，这种说法在中国很长时间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也被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具有空想及妥协性质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质区别。另一种观点提出马恩晚年转向了和平转变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对“暴力革命”持怀疑态度。但从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强烈的目的论追求使得马恩相信，最终一切社会矛盾的解决只可能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人的选择，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最后“决战”也只能是暴力革命，而不会有和平的可

1同上，第641页。

2同上，第642页。

3同上，第642页。

能性。但是是否在当下就盲目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进行革命，则取决于当时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他的历史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最终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得到“彻底的”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想通过暴力革命，将革命所产生的代价和牺牲降到最低。这种通过牺牲必要代价，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也很有市场，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共产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极具诱惑力。但也正如平克所指出的，“理解意识形态的暴力的困惑不在于心理学，而在于流行病学：一种毒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从少数自恋狂人扩散到整个大众，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执行他们的设计。”¹对此，他提出了从众效应导致的“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出于从众、表现忠诚和惧怕被惩罚，人们不仅公开效忠一种他们认为其他人也同样效忠的荒谬信仰，他们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效忠的人。”因此，“人众无知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稳定平衡，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强权社会的背叛者。”²这在中共革命也可以得到一定的验证。在整个革命阶段，可以说一开始都是主动积极参与者少，旁观者众，甚至在很多时候，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比如土改中的冲突，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异议和基层异动，都代表了民众对中共一些做法的不满。但是经过“镇反”、“反右”等社会整肃，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力的“稳定平衡”，即使“大饥荒”那样的社会灾难，仍保持了刚性稳定——当然，这种稳定是以底层社会的暴力泛滥即便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也不会传导和扩散为代价的。

而对于谎言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流行的实验，更突显了人性的弱点。在一个计算机心理实验中，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徒在一个社区聚集成群，他们在社区内压制那些持怀疑态度的邻居，而这些怀疑派邻居高估了周围的服从程度，自己开始渴望表达忠诚，于是也出头向其他人，包括自己的邻居强制执行规则。由此产生虚假服从和虚假强制的雪崩效应，最后令人厌恶的规则充斥整个社会。甚至，人们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真诚”，会坚持之

1同上，第642页。

2同上，第649页。

前的行为和判断，去强制推行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真心相信的信条。这也证明了梅西的人众无知模型，即一个社会可以被一种大多数人作为个体都不认同的信仰系统所占领。¹

最后，道德标尺的偏差，则会彻底让人克服自己的良知，犯下种种残暴的罪行。作恶者总是有一套自我开脱的说辞，他们惯于将自己的恶行解释为受到挑衅，有理由非自愿或者未产生严重后果。……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先是加工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认知失调消减”（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文革中的许多作恶者，甚至是“广西吃人事件”中的凶手，在文革后仍振振有词，不思悔改，就是这样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在起作用。

更为可悲的是，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不治之症，因为它源于多种让我们变得聪明伶俐的认知能力。对复杂因果关系的展望，团体协作的必要，乃至自利的理性，都让人们不顾自己的理智而追随甚至制造骗局。”² 面对这样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心魔”，人类无疑要运用足够的理性与自制才能克服。对此，平克的药方是“开放社会”，他认为“开放社会是一种防疫针，在开放社会中，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没有人会因传播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即使这些观点是异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现代的普世民主社会对于种族屠杀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战相对具有免疫力。相反，那些实行顽固的信息审查和对外封闭的政权往往陷入大规模的暴力。”³

三、对革命暴力的反思

共产革命的暴力现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灾难，给很多亲历者带来了无尽的肉体伤痛与精神创伤。时至今日，我们仍饱受革命暴力后遗症的影响，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路上蹒跚前行，并受尽日常暴力遗产的深切伤害。如何看待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暴力现

1同上，第649页。

2同上，第655页。

3同上，第656页。

象，无疑是提高心智，走向更好明天的重要前提。平克指出，面对暴力现象，人们除了往往“存在自利的道德标尺的偏差”外，¹还经常陷入“纯粹邪恶的迷思”：道德家们采取受害人的观点，认为“作恶是蓄意伤害，而且不需要理由，作恶的目的就是邪恶本身。”甚至解释罪恶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²他们假定大脑具有道德力量，这种思维无疑会妨碍我们理解真正的邪恶，并忽视了大部分伤害动机的平庸性。为此平克建议我们戴上鲍迈斯特所说的“心理学家的眼镜”，认识到人脑具有客观性，环境才是触发邪恶动机的源动力。

当我们戴上“心理学家的眼镜”看待中国革命的暴力现象时，就会发现这样一场革命是怎样触发了人性的暴力密码。根本上来讲，发生在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一场建立民族国家和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交织在一起，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又由于所处的历史文化土壤，自然产生了让人触目惊心的暴力现象。巨大的民族悲情感和意识形态压力，促使新政权走上了一条对内全面控制，对外全面封闭的道路。社会的封闭性无疑又加重了暴力现象的上演。

那么，我们如何将中国革命“从一种反叛型的运动变成一种进步型的事业”³呢？首先，暴力革命造成的大量后遗症是必须要审视的。由于中国革命是建立在“反启蒙”思潮的基础上的，至今理性、启蒙人文主义和普世价值仍没有在中国得到正面的承认。通往非暴力的道路是如此艰难，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缺乏“理性”、“自制”和“移情”的国度真正实现暴力的减少。

当然，我们仍可以对中国未来暴力现象的减少做出乐观的估计。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无知与迷信将日益被暴露，促进道德提升的信息流也将不断得到传播。暴力降低是文明整体进步的副产品，想依靠一个“先进”的意识形态，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成功的。时至今日，我相信启蒙和

1同上，第568页。

2同上，第573页。

3同上，第152页。

平权仍然是我们促进整体文明进步，减少暴力现象的重要手段。从革命回归日常，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让人类得以兴旺繁荣的途径，帮助人类解脱天性中的魔鬼，拥抱善良天使，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目标。■

【怀人】

忆母亲

——写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

秦 学

三月二十日，是母亲去世的祭日。

1991年，母亲去世在西南民族学院卫生所。那天，我们兄妹各自从单位赶到病房时，见她坐在椅子上已经咽气了。听护理她的刘阿姨说：“刚才，你妈比划着要坐起来，嘴里清楚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什么？这人不就是文革时整母亲最厉害的造反派头目之一吗？我简直不敢相信，已经昏迷九十多天，颅内血管大面积萎缩，近乎植物人的母亲，在她临终前居然叫出了时隔二十多年迫害她的人的名字！这是母亲灵魂深处理藏的愤怒在爆发；这是母亲用她仅有的力气对那场浩劫的控诉；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向世人倾诉她的冤屈啊！

文革爆发那年，我13岁，母亲刚满四十岁。作为民院当时唯一的“双肩挑”女性中层干部（“双肩挑”即既要教学，又要搞行政，这是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干部的特定称谓），母亲免不了揪出来陪斗和挨斗。最初，母亲对文革还比较淡定，嘴里老唸着“相信人民相信党”。红卫兵抄黑材料，半夜三更把她从床上揪出去，第二天晚上才放回来，她象是加了个夜班若无其事的回到家；一次参加批斗会陪斗回来，在饭桌上，她激动地告诉我们：“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坚强，把×××传给他的字条嚼了，咽进肚里都不交给红卫兵”。我们姊妹面面相觑，为母亲的正义感惊讶。那年，我小学毕业，老师在我

的毕业评语上明确写到：“只要你和父亲划清界线，你是能够考上重点中学的。”（因我父亲当时已是成都市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学校长）母亲看了评语后愤愤地说：“划清什么界线？又没定性，不管他，就报四中！”我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填报表上三个志愿都填的“成都四中”。一天，在四中读初一的哥哥哭丧着脸回到家，委屈地向母亲诉说了在学校受到的欺侮，不解地问：“妈妈，爸爸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母亲心疼却又镇静地对哥哥说：“你爸不是反革命，绝对不是，你要相信！那都是他们强加的罪名。”那时，母亲就是我们儿女们的精神支柱，是我心目中坚强的共产党员，我从母亲那又学到了一个新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随着文革的“深入”，批斗愈加频繁，方式愈加残忍，母亲头上戴了无数顶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等等，特别是一次批斗会上，母亲被打得鼻血长流，一张白色的印有红色小花的手绢上，全是鲜红的血，已经辨不清哪是小花了，母亲回到家里痛不欲生，我们五姊妹跪在她身边，求她不要离我们而去，哥哥愤怒的双眸盯着那张带着鲜血的手绢，哽咽着对母亲说：“妈妈，我一定要为你报仇！”。母亲一直将那张血手绢保存着，经常悄悄地看着手绢流泪，直到1980年，母亲瘫痪卧床不起，为了不刺激她，我才把它扔了。

母亲被打后精神开始有些变了，她告诉父亲说，周围的人都在骂她，甚至说我骂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父亲要我给母亲赔礼道歉，我百般解释都无济于事。母亲变得越发胆小了，每天窝在家里写交待检查材料。她想证明她不是地主的女儿，她解放前之所以能够进入四川大学上学，读的是不交学费的师范专业。她那时的生活费，是靠假期给表哥的子女补习功课挣的钱。她甚至让我悄悄到红墙巷找到那个白胡子老头（毕业于黄埔四期）、她的表哥给她写证明材料。即使这样，她也无法澄清她是特务的罪名。因为她在川大上学时，与父亲谈恋爱，毕业那年，他们到相馆照相时，巧遇川大校长黄季禄，黄和他们俩照了张合影，解放前夕黄去了台湾，他俩就成了“潜伏特务”，谁给谁证明都无效。造反派始终揪住母亲的这些问题不放，就是要把她搞臭搞垮。那段时间是母亲挨批斗最多

的日子。记得有一天下午，造反派又通知母亲到系里去接受批斗，母亲按照他们的要求，带着交待材料去了，直到天快黑了还没回家。我端着一个方凳，趴在窗前，朝着那条通向办公大楼的青砖小路望啊望，那条小路是母亲自文革以来最爱走的，她怕见到更多的人，不愿走两旁的大路。我趴在窗口望穿双眼都没见到她的影子。两个妹妹叫着饿了，外婆让我下来不等妈妈先吃饭吧。我不愿下凳子，也没吃晚饭，坚持要等。天黑尽了，借着远处昏暗的路灯，我见母亲低着头，慢慢地行走在那条小路上，我立刻冲下楼去，喊着“妈妈，妈妈”，母亲此时满面泪水，轻轻地告诉我：“我被×××煽了一耳光，现在耳朵有点听不清，眼睛也是花的。”我说：“妈妈，我牵你走，不会摔着的”，母亲点了点头，再也没有语言了。从那时起，母亲精神开始崩溃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哭着对我说：“我要到北京去告状，你们在家听婆婆的话，如果我死了，就是×××害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母亲的变化如此之大！他们从灵魂到肉体把母亲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母亲是那样的漂亮：一对大辫子，身穿藏装挺胸收腹的那张照片，多象个演员；

后来，大辫剪成了短辫，对盘在脑后，两边露出黑色的丝带，好洋气；

再后来母亲剪成了短发，十天半月就要到“美琪”理发店，让上海师傅弄一次头发。那时，我眼里的母亲是那样的高雅、端庄、自信、有气质。

可眼前，母亲已经人不人，鬼不鬼的，她的人格、尊严乃至肉体都受到了极度的摧残。这对于一个女性、一个极要强的女性、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极优秀的女性，是绝对无法接受的！要不是外婆和我们五个孩子在她身边，不知她死过多少回了！

没过几天，母亲果然不见了，我想：“母亲不会真的去北京了吧？”后来，我终于知道是父亲把母亲带到川大绿杨村躲起来了。在得到了母亲的允许后，我去川大和她生活了一段时间。

母亲的出走给全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民院“荣中泽朗事件”发生了，父亲 姐姐被红卫兵用枪押到他们驻地，刺刀直逼父亲的脖子，划出了一道血痕，他们要父亲把母亲交出

来，大声咆哮：“一命换一命”，枪托朝着父亲背上、腰上猛砸，父亲痛晕过去了，昏迷中父亲隐约听到：“打死他，打死他！”的狂叫，没等父亲完全清醒，又是一阵暴打（据父亲后来回忆：那晚是他平身经历的最黑暗悲惨的夜晚）。直到第二天下午，父亲拖着满是伤痛的身子回到家里。外婆心疼地跑到一楼邻居徐老师家，要了不少童子尿，让父亲坚持喝了一周多，说是治疗内伤有特效。

我和母亲在一起，还经历过有生以来最恐惧的一天。那是1967年的5月6日。那天中午母亲带我到市里，刚走到新华书店附近，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着：“老产开枪了！老产开枪了！”随后只见一辆辆大卡车，带着刺耳的口哨声，从我们身旁疾驶而过，车上挤满了带血的人，向着川医方向开去。又过了一会儿，几辆大卡车慢慢驶过来了，我亲眼看见，每辆车上都有几个带着臂章的人托着担架，担架上躺着尸体。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具尸体，头上眼睛部位是一道血槽，整个眼眶全不见了，鲜血还在流淌，我顿时想吐，使劲把母亲的手拽着，全身直打哆嗦，我颤抖着声音叫“妈妈快回家吧！”可是，两腿除了抖动没有一点力气。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吓得发抖”。母亲牵着我，朝着回家的路挪动着脚步。那天晚上，我一点东西都没吃，蒙在被窝里，久久不能入睡。后来我知道了，那就是全市闻名的“5·6”惨案，是文革派系斗争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那年我还不满十五岁。

派系斗争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们似乎轻松了一些。母亲和冯叔叔、孟叔叔、滕伯伯等称为走资派的“死党”、“红人”，被遣送到民院农场劳改。因为只有母亲一个女性，我有机会到农场陪同母亲住一房间。“劳改分子”们什么农活都要干，挖地、插秧、挑粪、拔草。一天，我看见母亲挑着两桶满满的粪水，弯着腰，一摇一晃地走在田埂上，粪水随着晃动四溅，母亲的裤腿上溅满了又脏又臭的粪水，挑粪对母亲来说确实困难，然而，母亲宁肯选择这样的困难！白天干活儿累了，晚饭后，有共同语言的“牛鬼蛇神”们围坐在小院里，苦中作乐，好不自在。喜欢喝酒的冯叔叔，用家里自做的酸菜就着酒，还风趣的叫我：“尝尝吧，这可是人间美味喔。”我心里突然生出难以名状的酸楚：人，最幸福的

莫过于自由吧！我看到了母亲脸上好久不见的笑容。晚上，我和母亲挤在一张小床上，母亲为我盖紧被子，抱着我，我又重新感到了母亲的温暖，母亲的爱！

1968年秋季，上山下乡开始了。父亲仍然关在牛棚里，两年多没发工资了，我们一家八口靠着母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好在我的外婆是个能吃苦又节俭的劳动妇女，替母亲把这个家撑着。姐姐哥哥都是第一批下乡对象，下乡需要的物品拿什么钱去买？母亲不得不让我去银行取点钱。万万没想到，我来到民院储蓄所取钱时，那个办事员黑着一张脸说：“你家的钱冻结了，不能取。”我问道：“为什么冻结？这是我爸妈的血汗钱，是我们家自己的钱！”她恶狠狠的说：“你爸是九种人之一，就要冻结。”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大声说道：“我爸还没定性，你凭什么说他是九种人？我就要取！”就这样，她一句我一句，在银行吵了一个上午，最终我仍没取到钱。回到家里，我把在银行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却高兴的对我说：“有骨气！没关系，我们再想办法”，其实我知道，母亲高兴的是，我帮她出了一口压抑在内心好久的恶气。后来，在母亲的指点下，我到父亲单位开了张什么证明，取到了一点够买下乡物品的钱。然而，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坚决不能存钱在银行。以至于后来我工作，有了收入的好多年，我都信守我的诺言，坚决不存钱在银行。直到女儿出国留学，需要有银行存款证明，我才不得不在银行开户存款。

知青下乡了，积压了三年的中小學生要复课了，所有市属中学收生都无法容纳那么多学生，成都的大专院校不得不开办中学。民院成立了“红卫中学”，母亲一边接受审查，一边承担“红卫中学”的教学管理。母亲有了工作，又像当年初到民院一样，亡命地工作。就在那时，45岁的她患了高血压，而且属于高危病人。毫无医学常识的母亲，既没用药，也没注意休息。再后来，母亲又调回到民院数理化系，仍然抓她的教学、行政工作。现在的人们都知道身体靠锻炼和保养，而母亲却放弃对体育的爱好，不顾身体变化的信号，把家庭家务交给外婆，一门心思全扑在她钟爱的教育事业上，她带着学生开门办学，若尔盖、马尔康、松潘高原那些高血压高危病人忌讳去的甘孜、阿坝、凉山民族地区，她几乎全去

了。生活的艰苦，过度的操劳，可怕的肾炎也找上了她！虽然母亲干起工作是愉悦的，但毕竟病魔不饶人，特别是那些年的心灵创伤、精神压抑、无法辩驳与倾诉的冤屈，长时间地侵蚀着她的身心。突然有一天，55岁的母亲全身失去了知觉，不能动弹，最终被华西医院确诊为脑血栓引起的偏瘫。母亲在瘫痪的十年里，做的最多的事，是她的痛苦回忆，每每看到她偏瘫的左手紧紧地拽着，侧靠在沙发，双泪流泪凝视着前方，我的心难过极了，总要赶紧打断她，让她从那场噩梦中醒来。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去世那天下午，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老天爷在为她哭泣，在为她喊冤！一个那样忠诚于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的母亲，25岁带着希望走进了民院，65岁带着冤屈从民院走了。没想到母亲留给我们的临终嘱咐竟是那三个字！其实在文革高校中，领导干部和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迫害和摧残，也不乏象×××这样曾经的同事，原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是在政治运动中灵魂深处的邪恶迸发出来，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实为教师队伍中的蛀虫。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我们在民院草拟的参加母亲追悼会的名单中划掉了那三个字。由我姐夫执笔，我们姊妹共同为母亲献上了一幅挽联，镌刻在她的墓碑上：

一身正气克己做人催发桃李累累四十年嫌太短

两袖清风俯首为牛化作春泥点点六五载恨不长

忆母亲，我们寄托无限的哀思；忆母亲，我们审视文革的爆发。十年文革就是十年浩劫、十年荒诞、十年破坏。历史车轮此时在险恶中颠簸后退，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被亵渎，中华民族蒙受巨大的灾难，受害者和施害者灵魂都在动乱中充分展现，有的被摧残，有的被扭曲，有人性的堕落，有心灵的美善。回忆那段历史，亲历者撕心裂肺，痛心不已；回忆那段历史，警示后人悲剧不能重演；回忆那段历史，让现代人认识和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做人做事。

我敬重的母亲，青春在民族教育上绽放，中年在文革迫害中煎熬，老年在疾病瘫痪里折磨，人生匆匆过往，你累了、你睡着了，你在天堂安息吧！

亲爱的母亲，你的儿女子孙永远怀念你！■

【序 跋】

追寻与命运

——造反派自述自序

黄玉梅

文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最空前的浩劫。它使社会陷入长期空前的内乱，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使和平时期的千万民众死于非命，使难以估量的历史文化古迹毁于一旦，极大的破坏了我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优良的道德构建，扭曲了人性，摧毁了人们心中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对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场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破坏，不亚于经历一场规模浩大的外侮入侵的战争。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地否定和定论：“文化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革已过去五十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是虚无。历史是曾经发生的事，是人类过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的思想认识、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经历。历史也不能虚无。它对于人类的今天——宏观上说，对于社会的发展，理想社会的构建，微观上说，对于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幸福指数……都有着无与伦比、可替代无与的意义。唐代名相魏征说“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俄罗斯历史学家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是之谓也。

现在五十五岁以下的人，对文革完全没有直观的记忆和感受。由于种种原因，文革至今没有得到广泛深入彻底的反思。因而对文革的误读，遗忘，改写，文革的思想理论，行为方法，甚至语言风格，都已形成集体无意识而被承继下来，这里那里，让人触目惊心。

回避和淡化都无法让那场旷世灾难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

未经正视和直面的历史，在新的条件下会披上新的画皮，戕害社会 and 我们的生活。甚至赤裸裸的继承下来，沿袭着五十年前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对抗历史前进的潮流。

对文革必须彻底深入的反思。

对造反派的研究是文革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造反派是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中的一派。它由文革而催生，经历了文革的大半个历程，制造和参与了文革中大大小小的许多事件，又因文革而灭。作为一个组织，他们存在的轨迹大部分时间和文革重叠。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造反派、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革。一时间，造反派成了文革的代名词，承担了文革的全部罪责。在早年一些反映文革的影视作品中，他们是整个文革的符号，以冲锋队的形象存在。一些经历了文革，如今也坚定地反对文革的人们，对造反派的认识也常常概念化，笼统化。而造反派本身，对当年历史 and 个人的经历的认识也会截然不同，继而对今天改革中社会现象的的评价不同，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

没有真实的历史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不正确的认识不能照亮今天更遑论未来。因此，完整的正确的认识造反派，他们缘何而来，到何处去，他们的产生，发展，在历史关头曾经的选择，追求，迷失，谵妄，狂热，幻灭……他们的主张，行为，思想，意识，都可以使今天的人们从中窥见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从而正确的认识历史，并形成对今天的观照。

所有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基于以上认识，也基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当年的造反派，并认识到自己在反思文革中应有的责任，从2000年开始，我多次返回广西，访问那些当年的造反派，那些本来是普普通通积极上进勤奋工作的工人，学生，教师……，那些在运动中冲冲杀杀，一度以为得了天条，亢奋无比，后来又历尽坎坷的人们，倾听他们的回忆和讲述。我不是文革研究者，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我只希望真实的还原当时事实，一个个人真实的经历和思想。

虽然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讲述还是使我非常的震撼。那里有许多我未曾了解的真相，未曾认识的社会和人生，那里有一颗颗需要理解的灵魂。

他们的讲述使我走出了固有的视野，从新的广度和深度认识文革。对于我，一个曾经是他们的队伍中的一员的人尚且如此，我坚定了关于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对于反思文革的意义认识。

这是一本民间口述史。叙述者大部分是柳州铁路地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少数是柳州地区部分文革受难者的家属。他们的叙述有的较详尽，有的较简略，有的记忆较清晰，有的思维较跳动，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大家遵循一个共同的认识：讲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真实思想。

笔者所做的工作，是将这些口述记录后整理成文。深知此事的意义，力求客观和审慎。一般是形成文字稿后，再交本人审阅，订正有出入之处，修改后再定稿。有些如是者三。同一件事，几个人说，凡有矛盾的，则必反复比较求，去伪取真。有些史实较为重要，但只有一人提到，则多方搜寻，找到应证，方才收入。所以本书涉及的史实，虽远不全面，但尽可能的真实。

我的访问得到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原柳铁工务段的工人杨建平先生，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对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对文革真相的追寻。从资料的无偿提供，到采访线索的联络，都提供了大量帮助。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仍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千里的笔者，交代未竟事宜。已高龄的王反修先生，帮助我联络了相当部分的访问线索，陪同采访，初稿完成

后，在与口述者反复核实，去伪存真的过程中，由于笔者远在千里之外，相当部分都由王先生协助完成。他们都是曾是柳铁地区文革的重要参与者，都曾经受多年牢狱之灾。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我的超越，对历史责任的主动承担，使我感动至深。

感谢几位受难者的亲属。揭开伤疤，再次触及亲人悲惨死去的往事，对他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和信任。

感谢所有的参与者，我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同学，感谢对我的理解、宽宥和支持。我才能最终把这件事完成。

采访中，我也强烈而感受到，五十年前恐惧的阴影，仍笼罩着许多在劫余生的人们。他们小心的保持着距离。一位很好的朋友，曾表示愿意帮我核对一些史料。终于发信来说，“当我试图着手来做的时候，我马上头痛欲裂，彻夜不眠……”我理解和尊重他们。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这正说明彻底反思文革，肃清流毒的必要。

而我自己，对那段历史的追寻与反思，倍加沉重。

而最终促使我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我记下一位无辜者的死难经过和他的妻子多年艰难上访的经历，有两处细节需找他的亲属核实。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当年只有三岁，在父亲带他回家的时候，目睹了他的父亲被人绑架。从此他再没有见过父亲——质问我：“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事？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惊愕之极。这口气，这思维方式，文革过来的人都会很熟悉。这种自以为站在政治正确的高地，先声夺人，动辄对人作诛心之论的思维方式，和文革一脉相承。可当年，他还只有三岁。

我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世间再无文革。曾经，我在灯下整理他母亲倾诉的事实经过时，看着窗外婆娑的树影，眼前竟幻化出那位死难者、那孩子的父亲（他还是那样的年轻）的灵魂，几十年后悄悄潜回自己的家，看望自己的妻儿的情景，不禁泪水潜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Elie Wiesel 说：“忘记死者，无异于二度杀死他们。”当然，我理解这种遗忘或故作遗忘可以有很多原因。其中，文革的真相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文革

的根源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以致于文革，那头超级巨大又超级恐怖的怪兽，它的阴影竟投射得如此久远，它的罪恶的理论和思想方法，似乎是轻而易举的，自然而然的，作为集体无意识遗传下来。

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访谈远不足以反映柳铁地区文革的全貌，这是很遗憾的。又局限于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认识能力，我错过了一些本来就很难得到的史实；又由于体例的局限（我把这本书定名为《造反派自述》）有一些其他范畴的史料没有收入，这也很可惜。以上都希望在有生之年，有机会得以补正。少数已在其他同类书刊中发表过的资料，依循出版惯例，也没有再收入。仅此说明。

是为序。■

【旧文新编】

小学生成了“反革命”

——双堡小学“教育革命”中的反标

郜银林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1月13日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

它的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说：“教才要删繁就简”。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近两年半了，双堡小学的小学生们，除了参加文革的各种群众集会，已经在土里玩了很长时间了。“复课闹革命”也应当让他们认认字了。

旧的课本肯定是不能用了，新的课本又没有，校长张嵩峰决定按毛主席说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才要删繁就简”。发动教师新编革命的红色教材。

张嵩峰看了低年级的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第二课是：打倒刘少奇！很讲阶斗争。就决定采用了。

1968年秋，双堡发现了反动标语，写的是：刘少奇万岁！打倒毛主席！震动了大南宋公社，震动了忻县革委会，公检法。到省公安厅请来寻侦专家，二十几人的破案人员进驻双堡，成年人会写字的都要写三条：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我是第一批被字迹比对寻侦专家排斥在外的。我们村大体有两千多人，被重点怀疑对象就有二十余人。说字是用变体写的，大家都认为是隐藏的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干的。由于我是大队清队组人员，知道二十余人的名单，希望不是我们这一派的人，比较好一些。这二十余人再次书写更多的字，上交。省里又来了更利害的笔迹辩识比对专家，搞了半月也无结果，把那二十余人折腾的面色都变了。

后来决定扩大到小学生，才发现真是小学生写的。这两个小学生，一个叫杜宝金，一个叫邢雨田。杜宝金，杜黄元的孙子，杜培华的儿子。杜黄元老实的农民，杜培华普通的干部，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和不良表现。邢雨田，邢相田的弟弟，出身贫农，党的基本群众。大家都想为他两开脱罪责。可那标语确是他俩写的，而是一人写一个字，一气呵成的。俩个小的现行反革命无疑。

第一次批斗大会盛况空前，小学全体师生参家，双方家长陪斗检查，只是由于是十岁左右的小孩没有被抓走，决定在校监督改造。我们村在先已抓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叫兰全生，五花大绑抓的，很渗人。他是“污辱江青”。

对杜宝金，邢雨田的批斗会开了若干次，开会次数太多了，两个小孩都木了。低头弯腰的姿态已有了定式。有时大家叫他们抬起头来说，他们一会就自动低头弯腰了。检查稿也背的烂熟。有五分钟的，十分钟的，还有一个钟头的。大人叫讲几分的，他们就说几分。斗的叫好多人看了心酸。家里出了小现行反革命，家人亲友也受牵连，抬不起头来。

后来这种反动标语愈来愈多，有的写在地上，有的刻在树上，有的写在石头上，有的写在砖头上。大家看到了，有杜宝金，邢雨田的结果，大家都不敢再报案了。我亲自发现两起都毁掉了。如果报案，不知那家孩子又要遭殃。

张嵩峰校长积极开展教育革命，按革命课本教小学生。他积极组织批判会，批杜宝金，邢雨田。他没想到，先教会小学生写：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这十个字会有何恶果。

小孩子们好胡写乱画，这是天性，他们会了这十个字，会到处乱写、胡拼。写出反动标语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那里搞的清楚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万岁和打倒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说的不对，你想一想你十岁时你懂的什么。

现再张嵩峰校长已经死了，不知他那时候，带领全校师生振臂高呼：打倒杜宝金！打倒邢雨田！时在想些什么。■

此文是郜银林 2012-10-05 写的博文（见郜银林博客），

现在的题目是本刊加的，原文有删节

【资料】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 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

人民日报 1966年6月18日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六月十三日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全文如下：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 and 高中，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

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为了不影响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学年开学，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老方

封面设计：夏青